

只在弄臣之例。不滿于後者的待遇的是司馬相如，他常常稱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獻殷勤，卻暗暗的作了關於封禪的文章，藏在家裏，以見他也有計畫大典——幫忙的本領，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壽終正寢』了。然而雖然並未實際上參與封禪的大典，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爲什麼呢？就因爲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時，『幫忙』和『幫閒』的可就混起來了，所謂國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詞臣，我們在南朝的幾個末代時，可以找出這實例。然而主雖然『庸』，卻不『陋』，所以那些幫閒者，文采卻究竟還有的，他們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滅。

誰說『幫閒文學』是一個惡毒的貶辭呢？

就是權門的清客，他也得會下幾盤棋，寫一筆字，畫畫兒，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這纔能不失其爲清客。也就是說，

清客，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爲，卻又非塔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家言』，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閒都做得出來的。必須有幫閒之志，又有幫閒之才，這才是真正的幫閒。如果有其志而無其才，亂點古書，重抄笑話，吹拍名士，拉扯趣聞，而居然不顧臉皮，大擺架子，反自以爲得意，——自然也還有人以爲有趣，——但按其實，卻不過『扯淡』而已。

幫閒的盛世是幫忙，到末代就只剩了這扯淡。

(六月六日。)

『中國小說史略』日本譯本序

聽到了拙著『中國小說史略』的日本譯『支那小說史』已經到了出版的機運，非常之高興，但因此又感到自己的衰退了。

回憶起來，大約四五年前罷，增田涉君幾乎每天到寓齋來商量這一本書，有時也縱談當時文壇的情形，很爲愉快。那時候，我是還有這樣的餘暇，而且也有再加研究的野心的。但光陰如駛，近來卻連一妻一子，也將爲累，至于收集書籍之類，更成爲身外的長物了。改訂『小說史略』的機緣，恐怕也未必有。所以恰如準備輟筆的老人，見了自己的全集的印成而高興一樣，我也因而高興的罷。

然而，積習好像也還是難忘的。關於小說史的事情，有時也還加

以注意，說起較大的事來，則有今年已成故人的馬廉教授，于去年翻印了『清平山堂』殘本，使宋人話本的材料更加豐富；鄭振鐸教授又證明了『四遊記』中的『西遊記』是吳承恩『西遊記』的摘錄，而並非祖本，這是可以訂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說的，那精確的論文，就收錄在『疇僕集』裏。還有一件，是『金瓶梅詞話』被發見于北平，爲通行至今的同書的祖本，文章雖比現行本粗率，對話卻全用山東的方言所寫，確切的證明了這決非江蘇人王世貞所作的書。

但我卻並不改訂，目覩其不完不備，置之不問，而只對於日本譯的出版，自在高興了。但願什麼時候，還有補這懶惰之過的時機。

這一本書，不消說，是一本有着寂寞的運命的書。然而增田君排除困難，加以翻譯，賽棧社主三上於菟吉氏不顧利害，給它出版，這是和將這寂寞的書帶到書齋裏去的讀者諸君，我都真心感謝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燈下，魯迅。

「題未定」草

極平常的豫想，也往往會給實驗打破。我向來總以為翻譯比創作容易，因為至少是無須構想。但到真的一譯，就會遇着難關，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創作時候可以迴避，翻譯上卻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昏眼花，好像在腦子裏面摸一個急于要開箱子的鑰匙，卻沒有。嚴又陵說，「一名之立，旬月躊躇」，是他的經驗之談，的確的確的。

新近就因為豫想的不對，自己找了一個苦喫 『世界文庫』的編

者要我譯果戈理的『死魂靈』，沒有細想，一口答應了。這書我不過曾經草草的看過一遍，覺得寫法平直，沒有現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時的人們還在蠟燭光下跳舞，可見也不會有什麼摩登名詞，爲中國所未有，非譯者來閉門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樣的名詞，譬如電燈，其實也不算新花樣了，一個電燈的另件，我叫得出六樣：花綫，燈泡，燈罩，沙袋，撲落，開關。但這是上海話，那後三個，在別處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裏有一篇短篇，講到鐵廠，後來有一位在北方鐵廠裏的讀者給我一封信，說其中的機件名目，沒有一個能够使他知道實物是什麼的。嗚呼，——這裡只好嗚呼了——其實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紀末我在江南學習挖礦時，得之老師的傳授。不知是古今異時，還是南北異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學家靠牠修養的『莊子』和『文選』或者明人小品裏，也找不出那些名目來。沒

有法子。「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最沒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還太自大，竟又小覷了『死魂靈』，以爲這倒不算什麼，擔當回來，真的又要翻譯了。於是『苦』字上頭。仔細一讀，不錯，寫法的確不過平鋪直敘，但到處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隱藏，要感得到；雖然重譯，也得竭力保存牠的鋒頭。裏面確沒有電燈和汽車，然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菜單，賭具，服裝，也都是陌生傢伙。這就勢必至于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語學程度的不够格。但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罰酒是應該喝乾的：硬着頭皮譯下去。到得煩厭，疲倦了的時候，就隨便拉本新出的雜誌來翻翻，算是休息。這是我的老牌氣，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災樂禍之意，其意若曰：這回是輪到我舒舒服服的來看你們在鬧什麼花樣了。

好像華蓋運還沒有交完，仍舊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學』四

卷六號，一翻開來，卷頭就有一幅紅印的大廣告，其中說是下一號裏，要有我的散文了，題目叫作『未定』。往回一想，編輯先生的確曾經給我一封信，叫我寄一點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謂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于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而又登出廣告來了，情同綁票，令我爲難。但同時又想到這也許還是自己錯，我曾經發表過，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乃是擠出來的。他大約正抓住了這弱點；在用擠出法；而且我遇見編輯先生們時，也間或覺得他們有想擠之狀，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說：『我的文章，是擠也擠不出來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談自己，以及有些文豪們的專講別人。

但是，積習還未盡除，稿費又究竟可以換米，寫一點也還不算什麼『冤沈海底』。筆，是有點古怪的，牠有編輯先生一樣的『擠』的

本領。袖手坐着，想打盹，筆一在手，面前放一張稿子紙，就往往會莫名其妙地寫出些什麼來。自然，要好，可不見得。

二

還是翻譯『死魂靈』的事情。躲在書房裏，是只有這類事情的。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牠歸化，還是盡量保存洋氣呢？日本文的譯者上田進君，是主張用前一法的。他以為諷刺作品的翻譯，第一當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廣大。所以他的譯文，有時就化一句為數句，很近乎解釋。我的意見卻兩樣的。只求易懂，不如創作，或者改作，將事改爲中國事，人也化爲中國人。如果還是翻譯，那麼，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牠

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牠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着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這保存，卻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牠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爲比較的順眼起見，只能改換他的衣裳，卻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剷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張削鼻剷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寧可譯得不順口。只是文句的組織，無須科學理論似的精密了，就隨隨便便，但副詞的『地』字，卻還是使用的，因爲我覺得現在看慣了這字的讀者已經很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發見我的新職業了：做西崽。

還是當作休息的翻雜誌，這回是在『人間世』二十八期上遇見了

林語堂先生的大文，摘錄會損精神，還是抄一段——

『……今人一味倣效西洋，自稱摩登，甚至不問中國文法，必欲倣效英文，分「歷史地」爲形容詞，「歷史地的」爲狀詞，以倣仿英文之 *historically*，拖一西洋辮子，然則「快來」何不因「快」字是狀詞而改爲「快地的來」？此類把戲，只是洋場孽少怪相，談文學雖不足，當西崽頗有才。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道，在於思。」（『今文八弊』中）

其實是「地」字之類的採用，並非一定從高等華人所擅長的英文而來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況且看上文的反問語氣，似乎「一味倣效西洋」的「今人」，實際上也並不將「快來」改爲「快地的來」，這僅是作者的虛構，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謂「保得自身爲主，則圓通自在，大暢無比」之例了。不過不切實，倘是「自稱

摩登』的『今人』所說，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還住在故鄉，看了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們那里只有幾個洋教堂，裏面想必各有幾位西息，然而很難得遇見。要研究西息，只能用自己做標本，雖不過『頗』，也够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後來竟到了上海，上海住着許多洋人，因此有着許多西息，因此也給了我許多相見的機會；不但相見，我還得了和他們中的幾位談天的光榮。不錯，他們懂洋話，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這是他們的喫飯傢伙，專用于服事洋東家的，他們決不將洋辮子拖進中國話裏來，自然更沒有搗亂中國文法的意思，有時也用幾個音譯字，如『那摩溫』，『土司』之類，但這也是向來用慣的話，並非標新立異，來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們倒是國粹家，一有餘閒，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換華裝，閒或請假出

游，有錢的就是緞鞋綢衫子。不過要戴草帽，眼鏡也不用瑋瑁邊的老樣色，倘用華洋的『門戶之見』看起來，這兩樣卻不免是缺點。

又倘使我要另找職業，能說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為我以為用工作換錢，西崽和華僕在人格上也並無高下，正如用勞力在外資工廠或華資工廠換得工資，或用學費在外國大學或中國大學取得資格，都沒有卑賤和清高之分一樣。西崽之可厭不在他的職業，而在他的『西崽相』。這里之所謂『相』，非說相貌，乃是『誠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內容』而言。這『相』，是覺得洋人勢力，高于羣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羣華人；但自己又系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于勢力高于羣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于還在洋人之下的羣華人。租界上的中國巡捕，也常常有這一種『相』。

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這就是現在洋場上的『西息相』。但又並不是騎牆，因為他是流動的，較爲『圓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樂，除非你掃了他的興頭。

三

由前所說，『西息相』就該和他的職業有關了，但又不全和職業相關，一部份卻來自未有西息以前的傳統。所以這一種相，有時是連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歷史上有過的，『自大』，事實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雖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卻又爲實際上所常見——他足以傲視一切連『事大』也不配的人們。有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衆人之上』的文素臣，就是這標本。他是崇華，抑夷，其實卻

是『滿息』；古之『滿息』，正猶今之『西息』也。

所以雖是我們讀書人，自以為勝西息遠甚，而洗伐未淨，說話一多，也常常會露出尾巴來的。再抄一段名文在這里——

『……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與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不是，自歎女兒身，事人以顏色，其苦不堪言。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道，在於學。』（『今文八弊』中）

但是，這種『新裝』的開始，想起來卻長久了，『紹介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於我的『摩羅詩力說』。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獻媚之心。後來上海的『小說月報』，還會為弱小

民族作品出過專號，這種風氣，現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過一脈的餘波。但生長于民國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勢奴才，拜金崽子，當然更不會知道。但即使現在紹介波蘭詩人，捷克文豪，怎麼便是『媚』呢？他們就沒有『已經聞名』的文人嗎？況且『已經聞名』，是誰聞其『名』，又何從而『聞』的呢？誠然，『英美德』，在中國有宣教師，在中國現有或曾有租界，幾處有駐軍，幾處有軍艦，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僅知有『大英』，『花旗』，『法蘭西』和『茄門』而不知世界上還有波蘭和捷克。但世界文學史，是用了文學的眼睛看，而不用勢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學無須用金錢和鎗礮作掩護，波蘭捷克，雖然未曾加入八國聯軍來打過北京，那文學卻在，不過有一些人，並未『已經聞名』而已。外國的文人，要在中國聞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够的，他反要得到輕薄。

所以一樣的沒有打過中國的國度的文學，如希臘的史詩，印度的寓言，亞刺伯的『天方夜談』，西班牙的『堂·吉訶德』，縱使在別國『已經聞名』，不下于『英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國卻被忘記了，他們或則國度已滅，或則無能，再也用不着『媚』字。

對於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語堂先生的訓詞移到這里來的——

『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於思。』

不過後兩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來思去，不過『奴』得巧妙一點而已。中國寧可有未『思』的西息。將來的文學倒較為有望。

但『已經聞名的英法德文人』，在中國卻確是不遇的。中國的立學校來學這四國話，為時已久，開初雖不過意在養成使館的譯員，

但後來卻展開，盛大了。學德語盛于清末的改革軍操，學法語盛于民國的『勤工儉學』。學英語最早，一爲了商務，二爲了海軍，而學英語的人數也最多，爲學英語而作的教科書和參考書也最多，由英語起家的學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軍不過將軍艦送人，介紹『已經聞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漢文的林紆，連紹介紹最大的『已經聞名』的莎士比亞的幾篇劇本的，也有待于並不專攻英文的田漢。這緣故，可真是非『在於思』則不可了。

然而現在又到了『今日介紹波蘭詩人，明日介紹捷克文豪』的危機，弱國文人，將聞名于中國，英美法德的文風，竟還不能和他們的財力武力，深入現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沒有恆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動手，但見山林映以電燈，語錄夾些洋話，『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德法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時，這才來『求一究竟』。

那些文人的作品，當然也是好極了的，然甲則曰不佞望洋而興歎，乙則曰汝輩何不潛心而探求。舊笑話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聞股肉可療，而自怕痛，執刀出門，執塗人臂，悍然割之，塗人驚拒，孝子謂曰，割股療父，乃是大孝，汝竟驚拒，豈是人哉！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說法雖乖，功效實同』，是好辯解。

（六月十日。）

名人和名言

『太白』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他舉出：第一道是說『要做白話由于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說『要白話做好，先須文言弄通』。十年之後，才來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爲你們說文言難，白話更難。理由是現在的口頭語，有許多是古語，非深通小學就不知道現在口頭語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寫錯。』……

太炎先生的話是極不錯的。現在的口頭語，並非一朝一夕，從天而降的語言，裏面當然有許多是古語，既有古語，當然會有許多曾見于古書，如果做白話的人，要每字都到『說文解字』裏去找本字，那

的確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難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從提倡白話以來，主張者卻沒有一個以為寫白話的主旨，是在從『小學』裏尋出本字來的，我們就用約定俗成的借字。誠然，如太炎先生說：『乍見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字；應人之稱曰「是唉」，「唉」即「也」字。』但我們即使知道了這兩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還是用『好呀』或『是唉』。因為白話是寫給現代的人們看，並非寫給商周秦漢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們也毫不畏縮。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實是文不對題的。這緣故，是因爲先生把他所專長的小學，用得範圍太廣了。

我們的知識很有限，誰都願意聽聽名人的指點，但這時就來了一個問題：聽博識家的話好，還是聽專門家的話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歷聽了兩家的種種指點以後，卻覺得必

須有相當的警戒。因為是：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的。

博識家的話多淺；意義自明，惟專門家的話多悖的事，還得加一點申說。他們的悖，未必悖在講述他們的專門，是悖在倚專家之名，來論他所專門以外的事。社會上崇敬名人，于是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卻忘記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名人被崇奉所誘惑，也忘記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漸以為一切無不勝人，無所不談，于是乎就悖起來了。其實，專門家除了他的專長之外，許多見識是往往不及博識家或常識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覺，小學的大師，倘談文獻，講『說文』，當然娓娓可聽，但一到攻擊現在的白話，便牛頭不對馬嘴，即其一例。還有江亢虎博士，是先前以講社會主義出名的名人，他的社會主義到底怎麼樣呢，我不知道。只是今年忘其所以，談到小學，說『「德」之古字爲「惠」』，從

「直」從「心」，「直」即直覺之意，卻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連那上半並不是曲直的直字這一點都不明白。這種解釋，卻須聽太炎先生了。

不過在社會上，大概總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所以譯一本歐洲史，就請英國話說得漂亮的名人校閱，編一本經濟學，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題簽；學界的名人紹介醫生，說他『術擅岐黃』，商界的名人稱讚畫家，說他『精研六法』。……

這也是一種現在的通病。德國的細胞病理學家維爾曉 (Virchow)，是醫學界的泰斗，舉國皆知的名人，在醫學史上的位置，是極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進化論，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幾回講演，據赫克爾 (Haeckel) 說，很給了大眾不少壞影響。因為他學問很深，名甚大，

于是自視甚高，以爲他所不解的，此後也無人能解，又不深研進化論，便一口歸功于上帝了。現在中國屢經介紹的法國昆蟲學大家法布耳（Fabre），也頗有這傾向。他的著作還有兩種缺點：一是嗤笑解剖學家，二是用人類道德于昆蟲界。但倘無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樣精到的觀察，因爲觀察的基礎，也還是解剖學；農學者根據對于人類的利害，分昆蟲爲益蟲和害蟲，是有理可說的，但憑了當時的人類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蟲爲善蟲或壞蟲，卻是多餘了。有些嚴正的科學者，對于法布耳的有微詞，實也並非無故。但倘若對這兩點先加警戒，那麼，他的大著作『昆蟲記』十卷，讀起來也還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書。

不過名人的流毒，在中國卻較爲利害，這還是科舉的餘波。那時候，儒生在私塾裏揣摩高頭講章，和天下國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

『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臨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辦學校，開煤礦，練新軍，造戰艦，條陳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績如何呢，不待我多說。

這病根至今還沒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滿天飛』之概。我想，自此以後，我們是應該將『名人的話』和『名言』分開來的，名人的話並不都是名言；許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這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分別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那一門，而對於他的專門以外的縱談，卻加以警戒。蘇州的學子是聰明的，他們請太炎先生講國學，卻不請他請簿記學或步兵操典，——可惜人們卻又不肯想得更細一點了。

我很自歎這回時時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大約也無傷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于我的所說，可是我想，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蓋亦「懸諸日月而不刊」之論也。

(七月一日。)

『靠天喫飯』

『靠天喫飯說』是我們中國的國寶。清朝中葉就有『靠天喫飯圖』的碑，民國初年，狀元陸潤庠先生也畫過一張：一個大『天』字，末一筆的尖端有一位老頭子靠着，捧了碗在喫飯。這圖曾經石印，信天派或嗜奇派，也許還有收藏的。

而大家也確是實行着這學說，和圖不同者，只是沒有碗捧而已。這學說總算存在着半。

前一月，我們曾經聽到過嚷着『旱象已成』，現在是梅雨天，連雨了十數日，是每年必有的常事，又並無颶風暴雨，卻又到處發現水災了。植樹節所種的變株樹，也不足以挽回天意。『五日一風，十日

「雨」的唐虞之世，去今已遠，靠天而竟至于不能喫飯，大約爲信天派所不及料的罷。到底還是做給俗人讀的『幼學瓊林』聰明，曰：『清輕者上浮而爲天』，『清輕』而又『上浮』，怎麼一個『靠』法。

古時候的真話，到現在就有些變成謊話。大約是西洋人說的罷，世界上窮人有份的，只有日光空氣和水。這在現在的上海就不適用，賣心賣力的被一天關到夜，他就曬不着日光，吸不到好空氣；裝不起自來水的，也喝不到乾淨水。報上往往說：『近來天時不正，疾病盛行』，這豈只是『天時不正』之故，『天何言哉』，牠默默地被冤枉了。

但是，『天』下去就要做不了『人』，沙漠中的居民爲了一塘水，爭奪起來比我們這里的才子爭奪愛人還激烈，他們要拚命，決不肯做一首『阿呀詩』就了事。洋大人斯坦因博士，不是從甘肅敦煌的沙漠

掘出了許多古董麼？那地方原是繁盛之區，靠天的結果，卻被天風吹了沙埋沒了。爲製造將來的古董起見，靠天確也是一種好方法，但爲活人計，卻是不大值得的。

一到道里，就不免要說征服自然了，但現在談不到，「帶住」可也。

(七月一日。)

幾乎無事的悲劇

果戈理 (Nikolai Gogol) 的名字，漸爲中國讀者所認識了，他的名著『死魂靈』的譯本，也已經發表了第一部的一半。那譯文雖然不能令人滿意，但總算藉此知道了從第二至六章，一共寫了五個地主的典型，諷刺固多，實則除一個老太婆和吝嗇鬼潑留希金外，都各有可愛之處，至于寫到農奴，卻沒有一點可取了，連他們誠心來幫紳士們的忙，也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果戈理自己就是地主。

然而當時的紳士們很不滿意，一定的照例的反擊，是說書中的典型，多是果戈理自己，而且他也並不知道大俄羅斯地主的情形。這是說得通的，作者是烏克蘭人，而看他的家信，有時也簡直和書中的地

主的意見相類似。然而即使他並不知道大俄羅斯的地主的情形罷，那創作出來的脚色，可真是生動極了，直到現在，縱使時代不同，國度不同，也還使我們像是遇見了有些熟識的人物。諷刺的本領，在這裡不及談，單說那獨特之處，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話，深刻的顯出當時地主的無聊生活。例如第四章裏的羅士特來夫，是地方惡少式的地主，趕熱鬧，愛賭博，撒大謊，要恭維，——但挨打也不要緊。他在酒店裏遇到乞乞科夫，誇示自己的好小狗，勒令乞乞科夫摸過狗耳朵之後，還要摸鼻子——

『乞乞科夫要和羅士特來夫表示好意，便摸了一下那狗的耳朵。』
「是的，會成功一四好狗的」。他加添着說。

『再摸摸牠那冰冷的鼻頭，拿手來呀！』因為要不使他掃興，乞乞科夫就又一碰那鼻子，於是說道：「不是平常的鼻子！」」

這種莽撞而沾沾自喜的主人，和深通世故的客人的圓滑的應酬，是我們現在還隨時可以遇見的，有些人簡直以此爲一世的交際術。

「不是平常的鼻子」，是怎樣的鼻子呢？說不明的，但聽者只要這樣也就足够了。後來又同到羅士特來夫的莊園去，歷覽他所有的田產和東西——

「還去看克理米亞的母狗，已經瞎了眼，據羅士特來夫說，是就要倒斃的。兩年以前，卻還是一條很好的母狗。大家也來察看這母狗，看起來，她也確乎瞎了眼。」

這時羅士特來夫並沒有說謊，他表揚着瞎了眼的母狗，看起來，也確是瞎了眼的母狗。這和大家有什麼關係呢，然而世界上有一些人，卻確是嚷鬧，表揚，誇示着這一類事，又竭力證實着這一類事，算是忙人和誠實人，在過了他的整一世。

這些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于沒有事情的悲劇，正如無聲的言語一樣，非由詩人畫出牠的形象來，是很不容易覺察的。然而人們滅亡于英雄的特別的悲劇者少，消磨于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于沒有事情的悲劇者卻多。

聽說果戈理的那些所謂「含淚的微笑」，在他本土，現在是已經無用了，來替代牠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別地方，也依然有用，因為其中還藏着許多活人的影子。況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淚的微笑」，倘傳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讀者的臉上，也就成爲健康：這是「死魂靈」的偉大處，也正是作者的悲哀處。

(七月十四日。)

三論「文人相輕」

『芒種』第八期上有一篇魏金枝先生的『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是爲以前的『文學論壇』上的『再論「文人相輕」』而發的。他先給了原則上的幾乎全體的贊成，說，『人應有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這是不錯的，文人應更有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這也是不錯的好惡，這是不錯的。』中間雖說『凡人在落難時節……能與猿鶴爲伍，自然最好，否則與鹿豕爲伍，也是好的。』即到千萬沒有辦法的時候，至于躺在破廟角裏，而與麻瘋病菌爲伍，倘然我的體力，尙能爲自然的抗禦，因而不致毀滅以死，也比實際上也做着騙子屠夫的所誘殺割割，較爲心願。』看起來好像有些微辭，但其實說的是他的憎惡騙子屠

夫，遠在猿鶴以至麻瘋病菌之上，和『論壇』上所說的『從聖賢一直敬到騙子屠夫，從美人香草一直愛到麻瘋病菌的文人，在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的話，也並不兩樣。至于說：『平心而論，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確論。』則在近來的莊子道友中，簡直是鶴立雞羣似的卓見了。

然而魏先生的大論的主旨，並不專在這一些，他要申明的是：是非難定，于是愛憎就爲難。因爲『譬如有一種人，……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無是非之分。……于是其所謂「是」，不免似是而實非了。』但『至于非中之是，它的是處，正勝過于似是之非，因爲其猶講交友之道，而無門閥之分』的。到這地步，我們的文人就只好吞吞吐吐，假措眼淚了。『似是之非』其實就是『非』，倘使已經看穿，不是只要給以熱烈的憎惡就成了嗎？然而『天下的事情，並沒有這麼

簡單」，又不得不愛護「非中之是」，何況還有「似非而是」和「是中之非」，取其大，略其細的方法，於是就不適用了。天下何嘗有黑暗，據物理學說，地球上的無論如何的黑暗中，不是總有 $\frac{1}{x}$ 分之一的光的嗎？看起書來，據理就該看見 $\frac{1}{x}$ 分之一的字的，——我們不能論明暗。

這並非刻薄的比喻，魏先生卻正走到「無是非」的結論的。他終于說：「總之，文人相輕，不外乎文的長短，道的是非，文既無長短可言，道又無是非之分，則空談是非，何補于事！已而已而，手無寸鐵的人呵！」人無全德，道無大成，剛說過「非中之是」，勝過「似是之非」怎麼立刻又變成「文既無長短可言，道又無是非之分」了呢？文人的鐵，就是文章，魏先生正在大做散文，力施搏擊，怎麼同時又說是「手無寸鐵」了呢？這可見要擡舉「非中之是」，卻又不肯

明說，事實上是怎樣的難，所以即使在那大文上列舉了許多對手的『排擠』，『大言』，『賣友』的惡諷，而且那大文正可通行無阻，卻還是覺得『手無寸鐵』；歸根結蒂，掉進『無是非』說的深坑裏，和自己以爲『原非確論』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說成了『朋友』——這裡不說『門閥』——了。

況且，『文既無長短可言，道又無是非之分』，魏先生的文章，就他自己的結論而言，就先沒有動筆的必要。不過要說結果，這無須動筆的動筆，卻還是有戰鬥的功効的，中國的有些文人一向謙虛，所以有時簡直會自己先躺在地上，說道，『倘然要講是非，也該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漢，我等小民，不任其咎。』明明是加入論戰中的了，卻又立刻肩出一面『小民』旗來。推得乾乾淨淨，連肋骨在那裏也找不到了。論『文人相輕』竟會到這地步，這真是叫 到了末路！

(七月十五日。)

【備考】

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

魏金枝

人應有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這是不錯的。文人應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熱烈的好惡，這也是不錯的，但天下的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除了是非之外，還有「似是而非」的「是」，和「非中有是」之非，在這當口，我們的好惡，便有些爲難了。

譬如有一種人，他們借着一個好看的幌子，做其爲所欲爲的勾當，不論是非，無分好惡，一概置之在所排擠之列，這叫做玉石俱焚，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無是非之分。但他還要大言不慚，自以爲是。於是其所謂「是」，不免似

是而實非了。這是我們在談話是非之前，所應最先將它分辯明白的。次則以趣觀之，往往有些具着兩張面孔的人，對於腰骨硬朗的，他會伏在地下，打供作揖，對於下一點的，也會裝起高大不可扳的怪腔，甚至給你當頭一脚，拒之千里之外。其時是非，便會煞時分手，各歸其主，因之好惡不同，也是常事。在此時際，要談是非，就得易地而處，平心而論，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確論。

至于非中之是，它的是處，正勝過於似是之非，因為其猶講交友之道，而無門閥之分。凡人在落難時節，沒有朋友，沒有六親，更無是非天道可言，能與猿鶴爲伍，自然最好，否則與鹿豕爲伍，也是好的，卽到千萬沒有辦法的時候，至於躺在破廟角裏，而與麻瘋病菌爲伍，倘然我的體

力，尙能爲自然的抗禦，因而不致毀滅以死，也比被實際上也做着騙子屠夫的所誘殺擄割，較爲心願。所以，倘然要講是非，也該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漢，我等小民，不任其咎。但近來那般似是的人，還在那裏大登告白，說是『少卿教匈奴爲兵』，那個意思，更爲兇惡，爲他營業，賣他朋友，甚而至於陷井下石，望人萬劫不復，那層似是甜衣，不是糖拌砒霜，是什麼呢？

總之，文人相輕，不外乎文的長短，道的是非，文既無長短可言，道又無是非之分，則空談是非，何補於事，已而已而，手無寸鐵的人呵！

（七月一日，『芒種』第八期。）

四論「文人相輕」

前一回沒有提到，魏金枝先生的大文『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裏，還有一點很有意思的文章。他以為現在『往往有些具着兩張面孔的人』，重甲而輕乙；他自然不至于主張文人應該對誰都打拱作揖，連稱久仰久仰的，只因爲乙君原是大可領敬的作者。所以甲乙兩位，『此時此際，要談是非，就得易地而處』，甲說你的甲話，乙呢，就覺得『非中之是，……正勝過于似是之非，因爲其猶講交友之道，而無門閥之分』，把『門閥』留給甲君，自去另找講交道的『朋友』，即使沒有，竟『與麻瘋病菌爲伍，……也比被實際上也做着騙子屠夫的所誘殺斃割，較爲心願』了。

這擁護『文人相輕』的情境，是悲壯的，但也正證明了現在一般之所謂『文人相輕』，至少，是魏先生所擁護的『文人相輕』，並不是因爲『文』，倒是爲了『交道』。朋友乃五常之一名，交道是人間的美德，當然也好得很。不過騙子有屏風，屠夫有幫手，在他們自己之間，卻也叫作『朋友』的。

『必也正名乎』，好名目當然也好得很。只可惜美名未必一定包着美德。『翻手爲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這是李太白先生罷，就早已『感慨係之矣』，更何況現在這洋場——古名『彝場』——的上海。最近的『大晚報』的副刊上就有一篇文章在通知我們要在上海交朋友，說話先須漂亮，這才不至于喫虧，見面第一句，是『格位（或「迪個」）朋友貴姓？』此時此際，這『朋友』兩字中還未含有任何利害，但說下去，就要一

步緊一步的顯出愛憎和取捨，即決定共同玩花樣，還是用作『阿木林』之分來了。『朋友，以義合者也。』古人確曾說過的，然而又有古人說：『義，利也。』嗚呼！

如果在冷路上走走，有時會遇見幾個人蹲在地上賭錢，莊家只是輸，押的只是贏，然而他們其實是莊家的一夥，就是所謂『屏風』——也就是他們自己之所謂『朋友』——目的是在引得蠢才眼熱，也來出手，然後掏空他的腰包。如果你站下來，他們又覺得你並非蠢才，只因爲好奇，未必來上當，就會說：『朋友，管自己走，沒有什麼好看。』這是一種朋友，不妨害騙局的朋友。荒場上又有變戲法的，石塊變白鴿，罈子裝小孩，本領大抵不很高強，明眼人本極容易看破，於是他們就時時拱手大叫道：『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這並非在要求撒錢，是請托你不要說破。這又是一種朋友，是不戳穿戲

法的朋友。把這些識時務的朋友穩住了，他才可以揶揄朋友的腰包；或者手執花鎗，來趕走不知趣的走近去窺探底細的傻子，惡狠狠的啐一口道『……瞎你們的眼睛！』

孩子的遭遇可是還要危險。現在有許多文章裏，不是常在很親熱的叫着『小朋友，小朋友』嗎？這是因為要請他做未來的主人公，把一切擔子都攔在他肩上了；至少，也得去買兒童畫報，雜誌，文庫之類，據說否則就要落伍。

已成年的作家們所佔領的文壇上，當然不至于有這麼彰明較著的可笑事，但地方究竟是上海，一面大叫朋友，一面卻要他悄悄的納錢五塊，買得『自己的園地』才有發表作品的權利的『交道』，可也不見得就不會出現的。

（八月十三日。）

五論「文人相輕」——明術

「文人相輕」是局外人或假充局外人的話。如果自己是這局面中人之一，那就是非被輕則是輕人，他決不用這對等的「相」字。但到無可奈何的時候，卻也可以拿這四個字來遮掩一下。這遮掩是逃路，然而也仍然是戰術，所以這口訣還被有一些人所寶愛。

不過這是後來的話。在先，當然是「輕」。

「輕」之術很不少。粗糙的說：大略有三種。一種是自卑，自己先躺在垃圾裏，然後來拖敵人，就是「我是畜生，但是我叫你爹爹，你既是畜生的爹爹，可見你也是畜生了」的法子。這形容自然未免過火一點，然而較文雅的現象，文壇上卻並不怎麼少見的。埋伏之法，

是里乙兩人的作品，思想和技術，分明不同，甚而至于相反的，某乙卻偏要設法表明，說惟獨自己的作品乃是某甲的嫡派；補救之法，是某乙的缺點倘被某甲所指摘，他就說這些事情不是某甲所具備，而且自己也正從某甲那里學了來的。此外，已經把別人評得一錢不值了，臨末卻又很謙虛的聲明自己並非批評家，凡有所說，也許全等于放屁之類，也屬于這一派。

一種是最正式的，就是自高，一面把不利于自己的批評，統統謂之『漫罵』，一面又竭力宣揚自己的好處，準備跨過別人。但這方法比較的麻煩，因為除『闢謠』之外，自吹自擂是究竟不很雅觀的，所以做這些文章時，自己得另用一個筆名，或者邀一些『講交道的』『朋友』來互助。不過弄得不好，那些『朋友』就會變成保駕的打手或擡轎的轎夫，而使那『朋友』會變成這一類人物的，則這御駕一定不過

是有些手勢的花花公子，擡來擡去，終於脫不了原形，一年半載之後，花花之上也再添不上什麼花頭去，而且打手轎夫，要而言之，也究竟要工食，倘非腰包飽滿，是沒法維持的。如果能用死轎夫，如袁中郎或『晚明二十家』之流來擡，再請一位活名人喝道，自然較爲輕而易舉，但看過去的成績和效驗，可也並不見佳。

還有一種是自己連名字也並不拋頭露面，只用匿名或由『朋友』給敵人以『批評』——要時髦些，就可以說是『批判』。尤其要緊的是給與一個名稱，像一般的『譚名』一樣。因爲讀者大衆的對於某一作者，是未必和『批評』或『批判』者同讎敵愾的，一篇文章，縱使題目用頭號字印成，他們也不大起勁，現在製出一個簡括的譚名，就可以比較的不容易忘記了。在近十年來的中國文壇上，這法術，用是也常用的，但效果卻很小。

法術原是極利害，極致命的法術。果戈理誇俄國人之善于給別人起名號——或者也是自誇——說是名號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牠也要跟着你走，怎麼擺也擺不脫。這正如傳神的寫意畫，並不細畫鬚眉，並不寫上名字，不過寥寥幾筆，而神情畢肖，只要見過被畫者的人，一看就知道這是誰；誇張了這人的特長——不論優點或弱點，卻更知道這是誰。可惜我們中國人並不怎樣擅長這本領。起源，是古的。從漢末到六朝之所謂『品題』，如『關東觥觥郭子橫』，『五經紛綸井大春』，就是這法術，但說的是優點居多。梁山泊上一百另八條好漢都有諱名，也是這一類，不過着眼多在形體，如『花和尚魯智深』和『青面獸楊志』，或者才能，如『浪裏白跳張順』，和『鼓上蚤時遷』等，並不能提挈這人的全般。直到後來的訟師，寫狀之際，還常常給被告加上一個諱名，以見他原是流氓地痞一類，然而不久也就

拆穿西洋鏡，即使毫無才能的師爺，也知道這是不足注意的了。現在的所謂文人，除了改用幾個新名詞之外，也並無進步，所以那些『批判』，結果還大抵是徒勞。

這失敗之處，是在不切帖。批評一個人，得到結論，加以簡括的名稱，雖只寥寥數字，卻很要明確的判斷力和表現的才能的。必須切帖，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離，這才會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現在卻大抵只是漫然的抓了一時之所謂惡名，摔了過去：或『封建餘孽』，或『布爾喬亞』，或『破鑼』或『無政府主義者』，或『利己主義者』……等等；而且怕一個不够致命，又連用些什麼『無政府主義封建餘孽』或『布爾喬亞破鑼利己主義者』；怕一人說沒有力，約朋友各給他一個；怕說一回還太少，一年內連給他幾個；時時改換，個個不同。這舉棋不定，就因為觀察不精，因而品題也不確，所以即使用盡

死勁，流完大汗，寫了出去，也還是和對方不相干，就是用漿糊粘在他身上，不久也就脫落了。汽車夫發怒，便罵洋車夫阿四一聲『豬羅』，頑皮孩子高興，也會在賣炒白果阿五的背上畫一個烏龜，雖然也許博得市僧們的一笑，但他們是決不因此就得『豬羅阿四』或『烏龜阿五』的諱名的。此理易明：因為不切帖。

五四時代的所謂『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是指做『載飛載鳴』的文章和抱住『文選』尋字彙的人們的，而某一種人確也是這一流，形容瀟灑，所以這名目的流傳也較為永久。除此之外，恐怕也沒有什麼還留在大家的記憶裏了。到現在，和這八個字可以匹敵的，或者只好推『洋場惡少』和『革命小販』了罷。前一聯出于古之『京』，後一聯出于今之『海』。

創作難，就是給人起一個稱號或諱名也不易。假使有誰能起頭撲

不破的譚名的罷，那麼，他如作評論，一定也是嚴肅正確的批評家，倘弄創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所以，連稱號或譚名起得不得法，也還是因為這班『朋友』的不『文』。——『再亮些！』

(八月十四日。)

『題未定』草(五)

M君寄給我一封剪下來的報章。這是近十年常有的事情，有時是雜誌。閒暇時翻檢一下，其中大概有一點和我相關的文章，甚至于還有『生腦膜炎』之類的惡消息。這時候，我就得預備大約一塊多錢的郵票，來寄信回答陸續函問的人們。至于寄報的人呢，大約有兩類：一是朋友，意思不過說，這刊物上的東西，有些和你相關；二，可就難說了，猜想起來，也許正是作者或編者，『你看，咱們在罵你了！』用的是『三國志演義』上的『三氣周瑜』或『罵死王朗』的法子。不過後一種近來少一些了，因為我的戰術是暫時擱起，並不給以反應，使他們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到後來卻也許會去撥一

撥誰的下巴：這于他們諸公是很不利的。

M君是屬於第一類的；剪報是『天津益世報』的『文學副刊』。其中有一篇張露薇先生做的『略論中國文壇』下有一行小註道：『偷懶，奴性，而忘掉了藝術』。只要看這題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記住藝術的批評家了。看起文章來，真的，痛快得很。我以為介紹別人的作品，刪節實在是極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應該設法流傳，萬不可聽其泯滅。不過紙墨也須顧及，所以只摘錄了第二段，就是『永遠是日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在這裡，也萬不能再少，因為我實在捨不得了——

『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於是便有許多人跟着別人學口號。特別是對於蘇聯，在目前的中國，一般所謂作家也者，都懷着好感。可是，我們是人，我們應該有自己的

人性，對於蘇聯的文學，尤其是對於那些由日本的淺薄的知識販賣者所得來的一知半解的蘇聯的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的話，我們所取的態度決不該是應聲蟲式的；我們所需要的介紹的和模倣的（其實是只有抄襲和盲目的應聲）方式也決不該是完全出於熱情的。主觀是對於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於事物的方法，我們有了一般奴隸性極深的作家，於是我們便有無數的空虛的標語和口號。

『然而我們沒有幾個懂得蘇聯的文學的人，只有一堆盲目的讚美者和零碎的翻譯者，而讚美者往往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胡說，翻譯者又不配合於他們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譯」，不得不說文不對題的話，一言以蔽之，他們的能
力永遠是對不起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意識」雖然正確了，

可是他們的工作却永遠是不正確的。

「從蘇聯到中國是很近的，可是爲什麼就非經過日本人的手不可？我們在日本人的羣中並沒有發現幾個真正了解蘇聯文學的新精神的人，爲什麼偏從淺薄的日本知識階級中去尋我們的食糧？這真是一件可恥的事實。我們爲什麼不直接的了解？爲什麼不取一種純粹客觀的工作的態度？爲什麼人家唱『新寫實主義』，我們跟着喊，人家換了『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我們又跟着喊；人家介紹紀德，我們才叫，人家介紹巴爾扎克，我們也號；然而我敢預言，在一千年以內：絕不會見到那些介紹紀德，巴爾扎克的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扎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

「我們再退一步，對於那些所謂『文學遺產』，我們並不

要求那些跟着人家對喊「文學遺產」的人們担負把那些「文學遺產」送給中國的「大眾」的責任。可是我們却要求那些人們有承受那些「遺產」的義務，這自然又是談不起來的。我們還記得在慶祝高爾基的四十年的創作生活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羣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幾個是知道高爾基的偉大在那兒的？……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報』。）

我並不想因此來研究「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主觀是對於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於事物的方法』這些難問題；我只

要說，誠如張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藝上，我們中國也的確太落後。法國有紀德和巴爾扎克，蘇聯有高爾基，我們沒有；日本叫喊起來了，我們才跟着叫喊，這也許真是『追隨』而且『永遠』，也就是『奴隸性』，而且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但是，並不『追隨』的叫喊其實是也有一些的，林語堂先生說過：『……其在文學，今日介紹波蘭詩人，明日介紹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爲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道，在於學。』（『人間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兩公，眼睛都有些斜視，只看了一面，各罵了一面，獨跳猶可，並排跳舞起來，那『勇敢』就未免化爲有趣了。

不過林先生主張『求一究竟』，張先生要求『直接了解』，這『實事求是』之心，兩位是大抵一致的，不過張先生比較的悲觀，因爲他

是『豫言』家，斷定了『在一千年以內，絕不會見到那些介紹紀德，巴爾扎克的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扎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的緣故。照這『預言』看起來，『直接了解』的張露薇先生自己，當然是一定不譯的了；別人呢，我還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決沒有目觀的希望。

豫言頗有點難。說得近一些，容易露破綻。還記得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吾先生手掄雙斧，從『創造』的大旗下，一躍而出的時候，曾經說，他不屑看流行的作品，要從冷落堆裏提出作家來。這是好的，雖然勃蘭兌斯曾從冷空中提出過伊孛生和尼采，但我們似乎也難以斥他為追隨或奴性。不大好的是他的這一張支票，到十多年後的現在還沒有兌現。說得遠一些罷，又容易成笑柄。江浙人相信風水，富翁往往豫先尋葬地；鄉下人知道一個故事：有風水先生給人尋好了墳穴，起

警道：『您百年之後，安葬下去，如果到第三代不發，請打我的嘴巴！』然而他的期限，比張露薇先生的期限還要少到約十分之九的樣子。

然而講已往的瑣事也不易。張露薇先生說慶祝高爾基四十年創作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然而那一羣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這質問是極不錯的。我只得招供：讀得很少，而且連高爾基十分之一的作品究竟是幾本也不知道。不過高爾基的全集，卻連他本國也還未出全，所以其實也無從計算。至于祝電，我以為打一個是應該的，似乎也並非中國人的恥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實在卻並沒有發，也沒有在任何電報底稿上簽名。這也並非怕有『奴性』，只因沒有人來邀，自己也想不到，過去了。發不妨，不發也不要緊，我想：發，高爾基大約不

至于說我是『日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不發，也未必說我是『張露薇的追隨者的作家』的。但對於綏拉菲摩維支的祝賀日，我卻發過一個祝電，因為我校印過中譯的『鐵流』。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也較難于想到，還不如測定爲對於高爾基發電的容易。當然，隨便說說也不要緊，然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話，對於有一些人卻大概是真的了。

張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識階級，他在同階級中發見了這許多奴隸，拿鞭子來抽，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但他和他所謂的奴隸們，也只隔了一張紙。如果有誰看過非洲的黑奴工頭，傲然的拿鞭子亂抽着做苦工的黑奴的電影的，拿來和這『略論中國文壇』的大文一比較，便會禁不住會心之笑。那一個和一羣，有這麼相近，卻又有這麼不

同，這一張紙真隔得利害：分清了奴隸和奴才。

我在這里，自以為總算又鉤下了一種新的偉大人物——一九三五年度文藝「豫言」家——的嘴臉的輪廓了。

（八月十六日。）

論毛筆之類

國貨也提倡得長久了，雖然上海的國貨公司並不發達，『國貨城』也早已關了城門，接着就將城牆撤去，日報上卻還常見關於國貨的專刊。那上面，受勸和挨罵的主角，照例也還是學生，兒童和婦女。

前幾天看見一篇關於筆墨的文章，中學生之流，很受了一頓訓斥，說他們十分之九，是用鋼筆和墨水的，這就使中國的筆墨沒有出路。自然，倒並不說這一類人就是什麼奸，但至少，恰如摩登婦女的愛用外國脂粉和香水似的，應負『入超』的若干的責任。

這話也並不錯的。不過我想，洋筆墨的用不用，要看我們的閒不閒。我自己是先在私塾裏用毛筆，後在學校裏用鋼筆，後來回到鄉下

又用毛筆的人，卻以爲假如我們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硯伸紙，磨墨揮毫的話，那麼，羊毫和松煙當然也很不壞。不過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寫得多，可就不成功了，這就是說，牠敵不過鋼筆和墨水。譬如在學校裏抄講義罷，即使改用墨盒，省去臨時磨墨之煩，但不久，墨水也會把毛筆膠住，寫不開了，你還得帶洗筆的水池，終於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擺開『文房四寶』。況且毛筆尖觸紙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細，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勞，越寫越慢。閒人不要緊，一忙，就覺得無論如何，總是墨水和鋼筆便當了。

青年裏面，當然也不免有洋服上掛一枝萬年筆，做做裝飾的人，但這究竟是少數，使用者的多，原因還是在便當。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決非勸諭，譏刺，痛罵之類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勸那些坐汽車的人，在北方改用驟車，在南方改用綠呢大轎試

試看。如果說這提議是笑話，那麼，勸學生改用毛筆呢？現在的青年，已經成了『廟頭鼓』，誰都不妨敲打了。一面有繁重的學科，古書的提倡，一面卻又有教育家喟然興嘆，說他們成績壞，不看報紙，昧于世界的大勢。

但是，連筆墨也乞靈于外國，那當然是不行的。這一點，卻要推前清的官僚聰明，他們在上海立過製造局，想造比筆墨更緊要的器械——雖然爲了『積重難返』，終於也造不出什麼東西來。歐洲人也聰明，金雞那原是斐洲的植物，因爲去偷種子，還死了幾個人，但竟偷到手，在自己這里種起來了，使我們現在如果發了瘡疾，可以很便當的大喫金雞那霜丸，而且還有『糖衣』，連不受服藥的嬌小姐們也喫得甜蜜蜜。製造墨水和鋼筆的法子，弄弄到手，是沒有偷金雞那子那麼危險的。所以與其勸人莫用墨水和鋼筆，倒不如自己來造墨水和鋼

筆；但必須造得好，切莫『掛羊頭賣狗肉』。要不然，這一番工夫就又是一個白費。

但我相信，凡有毛筆擁護論者大約也不免以我的提議爲空談：因爲這事情不容易。這也是事實；所以典當業只好呈請禁止奇裝異服，以免時價早晚不同，筆墨業也只好主張吮墨舐毫，以免國粹漸就淪喪。改造自己，總比禁止別人來得難。然而這辦法卻是沒有好結果的，不是無效，就是使一部份青年又變成舊式的斯文人。

（八月二十三日。）

逃 名

就在這幾天的上海報紙上，有一條廣告，題目是四個一寸見方的大字——

『看救命去！』

如果只看題目，恐怕會猜想到這是展覽着外科醫對重病人施行大手術，或對淹死的人用人工呼吸，救助觸礁船上的人員，挖掘崩壞的礦穴裏面的工人的。但其實並不是。還是照例的『籌賑水災遊藝大會』，看陳皮梅沈一呆的獨腳戲，月光歌舞團的歌舞之類。誠如廣告所說，『化洋五角，救人一命，……一舉兩得，何樂不爲』，錢是要拿去救命的，不過所『看』的卻其實還是遊藝，並不是『救命』。

有人說中國是『文字國』，有些像，卻還不充足，中國倒該說是最不看重文字的『文字遊戲國』，一切總愛玩些實際以上花樣，把字和詞的界說，鬧得一團糟，弄到暫時非把『解放』解作『孛戮』，『跳舞』解作『救命』不可。搗一場小亂子，就是偉人，編一本教科書，就是學者，造幾條文壇消息，就是作家。於是比較自愛的人，一聽到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駭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實是愛名的，逃的是這一團糟的名，不願意在那裏面。

天津『大公報』的副刊『小公園』，近來是標榜了重文不重名的。這見識很確當。不過也偶有『老作家』的作品，那當然爲了作品好，不是爲了名。然而八月十六日那一張上，卻發表了很有意思的『許多前輩作家附在來稿後面的叮囑』：

『把我這篇文章放在平日，我願意那樣

驕傲那樣。我和

熟人的名字並列得厭倦了，我願着擠在虎生生的新人羣裏，因為許多時候他們的東西來得還更新鮮。」

這些「前輩作家」們好像都撒了一點謊。「熟」，是不至于招致「厭倦」的。我們一離乳就喫飯或麪，直到現在，可謂熟極了，卻還沒有厭倦。這一點叮囑，如果不是編輯先生玩的雙簧的花樣，也不是前輩作家玩的藉此「返老還童」的花樣，那麼，這所證明的是：所謂「前輩作家」也者，有一批是盜名的，因此使別一批羞與爲伍，覺得和「熟人的名字並列得厭倦」，決計逃走了。

從此以後，他們只要「擠在虎生生的新人羣裏」就舒舒服服，還是作品也就「來得還更新鮮」了呢，現在很難測定。逃名，固然也不能說是豁達，但有去就，有愛憎，究竟總不失爲潔身自好之工。「小公園」裏，已經有人在現身說法了，而上海灘上，卻依然有人在「掏

腰包』，造消息，或自稱『言行一致』，或大呼『冤哉枉也』，或拖明朝死屍搭臺，或請現存古人喝道，或自收自己的大名入辭典中，定爲『中國作家』，或自編自己的作品入畫集裏，名曰『現代傑作』——忙忙碌碌，鬼鬼祟祟，煞是好看。

作家一排一排的坐着，將來使人笑，使人怕，還是使人『厭倦』呢？——現在也很難測定。但若據『前車之鑒』，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大約也還不免于『悲夫』的了！

(八月二十三日。)

六論「文人相輕」——二賣

今年文壇上的戰術，有幾乎是恢復了五六年前的太陽社式，年紀大又成爲一種罪狀了，叫作『倚老賣老』。

其實呢，罪是並不在『老』，而在于『賣』的，假使他在又麻醬，唸彌陀，一字不寫，就決不會惹青年作家的口誅筆伐。如果這推測並不錯，文壇上可又要增添各樣的罪人了，因爲現在的作家，有幾位總不免在他的『作品』之外，附送一點特產的贈品，有的賣富，說賣稿的文人的作品，都是要不得的；有人指出了他的詩思不過在太太的奩資中，就有幫閒的來說這人是因爲得不到這樣的太太，恰如狐狸的喫不到葡萄，所以只好說葡萄酸。有的賣窮，或賣病，說他的作品

是挨餓三天，吐血十口，這才做出來的，所以與衆不同。有的賣窮和富，說這刊物是因爲受了文閣文僚的排擠，自掏腰包，忍痛印出來的，所以又與衆不同。有的賣孝，說自己做這樣的文章，是因爲怕父親將來喫苦的緣故，那可更了不得，價值簡直和李密的『陳情表』不相上下了。有的就是啣煙斗，穿洋服，唉聲歎氣，顧影自憐，老是記着自己的韶年玉貌的少年哥兒，這里和『賣老』相對，姑且叫他『賣俏』罷。

不過中國的社會上，『賣老』的真也特別多。女人會穿針，有什麼稀奇呢，一到一百多歲，就可以開大會，穿給大家看，順便還捐錢了。說中國人『起碼要學狗』，倘是小學生的作文，是會遭先生的板子的，但大了幾十年，新聞上就大登特登，還用方體字標題道：『皤然一老蒞故都，吳稚暉語妙天下』；勸人解囊賑災的文章，並不少見，

而文中自述年紀曰：『余年九十六歲矣』者，卻只有馬相伯先生。但普通都不謂之『賣』，另有極好的稱呼，叫作『有價值』。

『老作家』的『老』字，就是一宗罪案，這法律在文壇上已經好幾年了，不過或者指爲落伍，或者說是把持，……總沒有指出明白的壞處。這回才由上海的青年作家揭發了要點，是在『賣』他的『老』。

那就不足慮了，很容易掃蕩。中國各業，多老牌子，文壇卻並不然，創作了幾年，就或者做官，或者改業，或者教書，或者捲逃，或者經商，或者造反，或者送命……不見了。『老』在那里的原已寥寥無幾，真有些像着英會裏的一百多歲的老太婆，居然會活到現在，連『民之父母』也覺得希奇古怪。而且她還會穿針，就尤其希奇古怪，使街頭巷尾弄得鬧嚷嚷。然而呀了，這其實是爲了奉旨旌表的緣故，如果一個十六七歲的漂亮姑娘登臺穿起針來，看的人也決不會少的。

誰有『賣老』的嗎？一遇到少的俏的就倒。

不過中國的文壇雖然幼稚，昏暗，卻還沒有這麼簡單；讀者雖說被『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但有辨別力的也不少，而且還要多起來。所以專門『賣老』，是不行的，因為文壇究竟不是養老堂，又所以專門『賣俏』，也不行的，因為文壇究竟不是妓院。

一賣俱非，由非見是，混沌之輩，以為兩傷。

（九月十二日。）

七論『文人相輕』——兩傷

所謂文人，輕個不完，弄得別一些作者搖頭歎氣了，以爲作踐了文苑。這自然也說得通。陶淵明先生『采菊東籬下』，心境必須清幽閒適，他這才能够『悠然見南山』，如果籬中籬外，有人大嚷大跳，大罵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卻『悠然』不得，只好『愕然見南山』了。現在和晉宋之交有些不同，連『象牙之塔』也已經搬到街頭來，似乎頗有『不隔』之意，然而也還得有幽閒，要不然，卽無以寄其沈痛，文壇減色，嚶嚶之罪大矣。于是相輕的文人們的處境，就也更加艱難起來，連街頭也不再是擾攘的地方了，真是塗窮道盡。

然而如果還要相輕又怎麼樣呢？前清有成例，知縣老爺出巡，路

遇兩人相打，不問青紅皂白，誰是誰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輕的文人們縱有『肅靜』『迴避』牌，卻無小板子，打是自然不至於的，他還是用『筆伐』，說兩面都不是好東西。這里有一段炯之先生的『談談上海的刊物』爲例——

『說到這種爭鬥，使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的爭鬥成績。這成績就是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丑角，等於木偶戲的互相揪打或以頭互碰，除了讀者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以外，別無所有。把讀者養成歡喜看「戲」不歡喜看「書」的習氣，「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爲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爭鬥的延長，無結果的延長，實在可說是中國讀者的大不幸。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佔篇幅少一些？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結起

眼來若只是這些精巧的對罵，這文壇，未免太可憐了。」

（天津『大公報』的『小公園』，八月十八日。）

『這種鬥爭』，炯之先生還自有一個界說：『卽是向異己者用一種瑣碎方法，加以無憐憫，不節制的辱罵。（一個術語，便是「鬥爭」。）』云。

于是乎這位炯之先生便以憐憫之心，節制之筆，定兩造爲丑角，覺文壇之可憐了，雖然『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似乎不但並不以『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爲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簡直不登什麼『文壇消息』。不過『罵』是有的；只『看熱鬧』的讀者，大約一定也有的。試看路上兩人相打，他們何嘗沒有是非曲直之分，但旁觀者往往只覺得有趣；就是綁出法場去，也是不問罪狀，單看熱鬧的居多。由這情形，推而廣之以至于文壇，

真令人有不如逆來順受，唾面自乾之感。到這裏來一個『然而』罷，轉過來是旁觀者或讀者，其實又並不全如炯之先生所擬定的混沌，有些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斷的。所以昔者古典主義者和羅曼主義者相罵，甚而至于相打，他們並不都成爲丑角，左拉遭了劇烈的文字和圖畫的嘲罵，終于不成爲丑角；連生前身敗名裂的王爾德，現在也不算是丑角。

自然，他們有作品。但中國也有的。中國的作品『可憐』得很，誠然，但這不只是文壇可憐，也是時代可憐，而且這可憐中，連『看熱鬧』的讀者和論客都在內。凡有可憐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憐的時代。昔之名人說『恕』字訣——但他們說，對於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說『忍』字訣，春天的論客以『文人相輕』混淆黑白，秋天的論客以『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丑角』抹殺是

非。冷冰冰陰森森的平安的古塚中，怎麼會有生人氣？

『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佔篇幅少一些？』
——炯之先生問。有是有的。縱使名之曰『私罵』，但大約決不會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較近于『公』，在『罵』之中，有的較合于『理』的，居然來加評論的人，就該放棄了『看熱鬧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說出你究以爲那一面較『是』，那一面較『非』來。

至于文人，則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彼兌飛說得好：

我的愛並不是歡欣安靜的人家，

花園似的，將平和一門關住，

其中有『幸福』慈愛地往來，
而撫養那『歡欣』，那嬌小的仙女。

我的愛，就如荒涼的沙漠一般——

一個大盜似的有嫉妬在那里霸着：

他的劍是絕望的瘋狂，

而每一刺是各樣的謀殺！

(九月十二日。)

蕭紅作『生死場』序

記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時維二月，我和婦孺正陷在上海關北的火綫中，眼見中國人的因爲逃走或死亡而絕迹。後來仗着幾個朋友的幫助，這才得進平和的英租界，難民雖然滿路，居人卻很安閒。和關北相距不過四五里罷，就是一個這麼不同的世界，——我們又怎麼會想到哈爾濱。

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關北，周圍又復熙熙攘攘的時候了。但卻看見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爾濱。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于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活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

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

聽說文學社曾經願意給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那里去，攔了半年，結果是不許可。人常常會事後才聰明，回想起來，這正是當然的事：對於生的堅強和死的掙扎，恐怕也確是大背『訓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爲了『略談皇帝』這一篇文章，這一個氣燄萬丈的委員會就忽然烟消火滅，便是『以身作則』的實地大教訓。

奴隸社以汗血換來的幾文錢，想爲這本書出版，卻又在我們的上司『以身作則』的半年之後了，還要我寫幾句序。然而這幾天，卻又謠言蜂起，閘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頭鼠竄了，路上是駱驛不

絕的行李車和人，路旁是黃白兩色的外人，含笑在賞鑑這禮讓之邦的盛況。自以爲居于安全地帶的報館的報紙，則稱這些逃命者爲『庸人』或『愚民』。我卻以爲他們也許是聰明的，至少，是已經憑着經驗，知道了煌煌的官樣文章之不可信。他們還有些記性。

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裏，我在燈下再看完了『生死場』。周圍像死一般寂靜，聽慣的隣人的談話聲沒有了，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想起來，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懷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現在卻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這正是奴隸的心！——但是，如果還是擾亂了讀者的心呢？那麼，我們還決不是奴才。

不過與其聽我還在安坐中的牢騷話，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場』，

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

魯迅。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爲日本三竺書房『陀思妥夫斯基

全集』普及本作——

到了關於陀思妥夫斯基，不能不說一兩句話的時候了。說什麼呢？他太偉大了，而自己卻沒有很細心的讀過他的作品。

回想起來，在年青時候，讀了偉大的文學者的作品，雖然敬服那作者，然而總不能愛的，一共有兩個人。一個是但丁，那『神曲』的煉獄裏，就有我所愛的異端在；有些鬼魂還在把很重的石頭，推上峻峭的巖壁去。這是極喫力的工作，但一鬆手，可就立刻壓爛了自己。

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這地方停住，沒有能夠走到天國去。

還有一個，就是陀思妥夫斯基。一讀他二十四歲時所作的『窮人』，就已經喫驚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後來，他竟作爲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時也是殘酷的拷問官而出現了。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煉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利的處死，竭力要放它們活得長久。而這陀思妥夫斯基，則彷彿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惱，和拷問官一同高興着似的。這決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總而言之，就因爲偉大的緣故。但我自己，卻常常想廢書不觀。

醫學者往往用病態來解釋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這倫勃羅梭式的

說明，在現今的大多數的國度裏，恐怕實在也非常便利，能得一般人們的贊許的。但是，即使他是神經病者，也是俄國專制時代的神經病者，倘若誰身受了他相類的重壓，那麼，愈身受，也就會愈懂得他那夾着誇張的真實，熱到發冷的熱情，快要破裂的忍從，於是愛他起來的罷。

不過作爲中國的讀者的我——卻還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的忍從——對於橫逆之來的真正的忍從。在中國，沒有俄國的基督。在中國，君臨的是『禮』，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從，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堅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歲的所謂節婦身上，也許偶然可以發見罷，但在一般的人們，卻沒有。忍從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爲恐怕也還是虛偽。因爲壓迫者指爲被壓迫者的不德之一的這虛偽，對於同類，是惡，而對於壓迫者，卻是道德。

的。

但是，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從，終於也並不只成了說教或抗議就完結。因為這是當不住的忍從，太偉大的忍從的緣故。人們也只好帶着罪業，一直闖進但丁的天國，在這裡這才大家合唱着，再來修練天人的功德了。只有中庸的人，固然並無墮入地獄的危險，但也恐怕進不了天國的罷。

(十一月二十日。)

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

日記或書信，是向來有些讀者的。先前是在看朝章國故，麗句清詞，如何抑揚，怎樣請託，於是害得名人連寫日記和信也不敢隨隨便便。晉人寫信，已經得聲明『匆匆不暇草書』，今人作日記，竟日便要防傳鈔，來不及出版。王爾德的自述，至今還有一部份未曾公開，羅曼羅蘭的日記，約在死後十年才可發表，這在我們中國恐怕辦不到。

不過現在的讀文人的非文學作品，大約目的已經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較的歐化了的：遠之，在鉤稽文壇的故實，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後者似乎要居多數。因為一個人的言行，總有一部分願

意別人知道，或者不妨給別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卻不然。然而一個人的脾氣，又偏愛知道別人不肯給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牘就有了出路。這並非等于窺探門縫，意在發人的陰私，實在是因為要知道這人的全般，就是從不注意處，看出這人——社會的一分子的真實。

就是在『文學概論』上有了名目的創作上，作者本來也掩不住自己，無論寫的是什麼，這個人總還是這個人，不過加了些藻飾，有了些排場，彷彿穿上了制服。寫信固然比較的隨便，然而做作慣了的，仍不免帶些慣性，別人以為他這回是赤條條的上場了罷，他其實還是穿着肉色緊身小衫褲，甚至于用了平常決不應用的奶罩。話雖如此，比起峨冠博帶的時候來，這一回可究竟較近于真實。所以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不過也不能十分當真。有些作者，是連賬簿也用心

機的，叔本華記賬就用梵文，不願意別人明白。

另境先生的編這部書，我想是爲了顯示文人的全貌的，好在用心之古奧如叔本華先生者，中國還未必有。只是我的做序，可不比寫信，總不免用些做序的拳經：這是要請編者讀者，大家心照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夜，魯迅記于上海開北之且介亭。

雜談小品文

自從『小品文』這一個名目流行以來，看看書店廣告，連信札，論文，都排在小品文裏了，這自然只是生意經，不足爲據。一般的意見，第一是在篇幅短。

但篇幅短並不是小品文的特徵。一條幾何定理不過數十字，一部『老子』只有五千言，都不能說是小品。這該像佛經的小乘似的，先看內容，然後講篇幅。講小道理，或沒道理，而又不是長篇的，才可謂之小品。至于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謂之『短文』，短當然不及長，寥寥幾句，也說不盡森羅萬象，然而牠並不『小』。

『史記』裏的『伯夷列傳』和『屈原賈誼列傳』除了引用的騷

賦，其實也不過是小品，只因爲他是『太史公』之作，又常見，所以沒有人來選出，翻印。由晉至唐，也很有幾個作家；宋文我不知道，但『江湖派』詩，卻確是我所謂的小品。現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據說『抒寫性靈』是牠的特色。那時有一些人，確也只能夠抒寫性靈的，風氣和環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也只能有這樣的意思，寫這樣的文章。雖說抒寫性靈，其實後來仍落了窠臼，不過是『賦得性靈』，照例寫出那麼一套來。當然也有人豫感到危難，後來是身歷了危難的，所以小品文中，有時也夾着感憤，但在文字獄時，都被銷燬，劈板了，於是我們所見，就只剩了『天馬行空』似的超然的性靈。

這經過清朝檢選的『性靈』，到得現在，卻剛剛相宜，有明末的洒脫，無清初的所謂『悖謬』，有國時是高人，沒國時還不失爲逸

士。逸士也得有資格，首先即在『超然』，『士』所以超庸奴，『逸』所以超責任；現在的特重明清小品，其實是大有理由，毫不足怪的。

不過『高人兼逸士夢』恐怕也不長久。近一年來，就露了大破綻，自以為高一點的，已經滿紙空言，甚而至于胡說八道，下流的卻成爲打諢，和猥鄙丑角，並無不同，主意只在挖公子哥兒們的跳舞之資，和舞女們爭生意，可憐之狀，已經下于五四運動前後的鴛鴦蝴蝶派數等了。

爲了這小品文的盛行，今年就又有翻印所謂『珍本』的事。有些論者，也以爲可慮。我卻覺得這是並非無用的。原本價貴，大抵無力購買，現在只用了一元或數角，就可以看見現代名人的祖師，以及先前的性靈，怎樣疊牀架屋，現在的性靈，怎樣看人學樣，啃過一堆牛骨頭，即使是牛骨頭，不也有了識見，可以不再被生炒牛角尖騙去了。

嗎？

不過『珍本』並不就是『善本』，有些是正因為牠無聊，沒有人要看，這才日就滅亡，少下去；因為少，所以『珍』起來。就是舊書店裏必討大價的所謂『禁書』，也並非都是慷慨激昂，令人奮起的作品，清初，單爲了作者也會禁，往往和內容簡直不相干。這一層，卻要讀者有選擇的眼光，也希望識者給相當的指點的。

(十二月二日。)

『題未定』草

六

記得丁君曾經對我談起過：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後，施蟄存先生曾在什麼刊物上有過批評，以為這本書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選一下。我至今沒有看到那刊物；但從施先生的推崇『文選』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業，以及自標『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測起來，這也正像他的話。好在我現在並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着多管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無論誰說，都是對的。其實豈只這一

本書，將來重開四庫館時，恐怕我的一切譯作，全在排除之列；雖是現在，天津圖書館的目錄上，在『吶喊』和『彷徨』之下，就注着一個『銷』字，『銷』者，銷燬之謂也；梁實秋教授充當什麼圖書館主任時，聽說也曾將我的許多譯作驅逐出境。但從一般的情形而論，目前的出版界，卻實在並不十分謹嚴，所以印了我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麼特別糟蹋了紙墨。至于選本，我倒以為是弊多利少的，記得前年就寫過一篇『選本』，說明着自己的意見，後來就收在『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隨便玩玩，那是什麼選本都可以的，『文選』好，『古文觀止』也可以。不過倘要研究文學或某一作家，所謂『知人論世』，那麼，足以應用的選本就很難得。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

準確，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例如蔡邕，選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讀者僅覺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須看見『蔡中郎集』裏的『述行賦』（也見于『續古文苑』），那些『窮工巧于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溼，委嘉穀于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手頭無書，也許記錯，容後訂正）的句子，才明白他並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時的情形，明白他確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讚賞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裏，他卻有時很摩登，『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牀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爲『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雖然後來自說因爲『止于禮義』，未能進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

究竟是大膽的。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着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裏，尊爲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我每見近人的稱引陶淵明，往往不禁爲古人惋惜。

這也是關於取用文學遺產的問題，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總歸得不到。前幾天，看見『時事新報』的『青光』上，引過林語堂先生的話，原文拋掉了，大意是說：老莊是上流，潑婦罵街之類是下流，他都要看，只有中流，剽上竊下，最無足觀。如果我所記

憶的並不錯，那麼，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語錄，明人小品，下至『論語』，『人間世』，『宇宙風』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澈的表白了其人的毫無自信。不過這還是空腹高心之談，因為雖是『中流』，也並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竊，有取了好處的，有取了無用之處的，有取了壞處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連剽竊也不會，『老莊』不必說了，雖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嘗真的看得懂。

標點古文，不但使應試的學生爲難，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學者出醜，亂點詞曲，拆散駢文的美談，已經成爲陳迹，也不必回顧了；今年出了許多廉價的所謂珍本書，都有名家標點，關心世道者怒然憂之，以爲足煽復古之燄。我卻沒有這麼悲觀，化國幣一元數角，買了幾本，既讀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標點；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結論，就從這裡得來的。

例如罷，——這種舉例，是很危險的，從古到今，文人的送命，往往並非他的什麼『意德沃羅基』的悖謬，倒是爲了個人的私仇居多。然而這里仍得舉，因爲寫到這里，必須有例，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者是也。但經再三忖度，決定『姑隱其名』，或者得免于難歟，這是在利用中國人只顧空面子的缺點。

例如罷，我買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張岱的『瑯嬛文集』，『特印本實價四角』；據『乙亥十月，盧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塗爲康莊』的，但照標點看下去，卻並不十分『康莊』。標點，對于五言或七言詩最容易，不必文學家，只要數學家就行，樂府就不大『康莊』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裏，有了難懂的句子：

「……佩鉛刀。藏膝髀。太史奏。機謀破。不稱王向前。
坐對御衣含血唾。……」

琅琅可誦，韻也押的，不過『不稱王向前』這一句總有些費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躍而詢上。大怒曰。毋謂我王。卽王敢爾耶。清曰。今日之號。尙稱王哉。命抉其齒。王且詢。則含血前。滄御衣。上益怒。剝其膚。……』（標點悉遵原本）那麼，詩該是『不稱王，向前坐』了，『不稱王』者，『尙稱王哉』也；『向前坐』者，『則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躍而詢上。大怒曰』，恐怕也該是『躍而詢。上大怒曰』才合式，據作文之初階，觀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縱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如何『性靈』，拿牠亂玩究竟還是不行的，自誤事小，誤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脊令操』序裏，有這樣的句子：

『秦府僚屬。勸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門。射

殺建成元吉魏徵。傷亡作。』

文章也很通，不過一翻『唐書』，就不免覺得魏徵實在射殺得冤枉，他其實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後，這才病死的。所以我們沒有法，這裡只好點作『射殺建成元吉，魏徵傷亡作』。明明是張岱作的琴操，怎麼會是魏徵作呢，索性也將他射殺乾淨，固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中流』文人，是常有擬作的，例如韓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說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所以在這裡，也還是以『魏徵傷亡作』爲穩當。

我在這裡也犯了『文人相輕』罪，其罪狀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將功折罪』的，是證明了有些名人，連文章也看不懂，點不斷，如果選起文章來，說這篇好，那篇壞，實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認真讀書的人，一不可倚仗選本，二不可憑信標點。

還有一樣最能引讀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牠往往是衣裳上撕下來的一塊繡花，經摘取者一吹噓或附會，說是怎樣超然物外，與塵濁無干，讀者沒有見過全體，便也被他弄得迷離惝恍。最顯著的便是上文說過的『悠然見南山』的例子，忘記了陶潛的『述酒』和『讀山海經』等詩，捏成他單是一個飄飄然，就是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學生』的十二月號上，看見了朱光潛先生的『說「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的文章，推這兩句爲詩美的極致，我覺得也未免有以割裂爲美的小疵。他說的好處是：

『我愛這兩句詩多少是因爲它對於我啓示了一種哲學的意蘊。「曲終人不見」所表現的是消逝，「江上數峯青」所表

現的是永恆。可愛的樂聲和奏樂者雖然消逝了，而青山卻巍然如舊，永遠可以讓我們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淒涼的，要求伴侶的。曲終了，人去了，我們一霎時以前所遊目騁懷的世界猛然間好像從腳底倒塌去了。這是人生最難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轉眼間我們看到江上青峯，好像又找到另一個可親的伴侶，另一個可託足的世界，而且它永遠是在那裏的。「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種風味似之。不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麼；這一曲纏綿悱惻的音樂沒有驚動山靈？它沒有傳出江上青峯的嫵媚和嚴肅？它沒有深深地印在這嫵媚和嚴肅裏面？反正青山和湘靈的瑟聲已發生這麼一回的因緣，青山永在，瑟聲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這確已說明了他的所以激賞的原因。但也沒有盡。讀者是種種不同的，有的愛讀『江賦』和『海賦』，有的欣賞『小園』或『枯樹』。後者是徘徊于有無生滅之間的文人，對於人生，既憚擾攘，又怕離去，懶于求生，又不樂死，實有太板，寂絕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淒涼，所以又必須有一種撫慰。于是『曲終人不見』之外，如『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或『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之類，就往往爲人所稱道。因爲眼前不見，而遠處卻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這就是道士之所以說『至心歸命禮，玉皇大天尊！』也。

撫慰勞人的聖藥，在詩，用朱先生的話來說，是『靜穆』：

『藝術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爲人而論，他所感到的歡喜和愁苦也許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爲詩人而論，熱烈的歡喜或熱烈的愁苦經過詩表現

出來以後，都好比黃酒經過長久年代的儲藏，失去它的辣性，祇剩一味醇樸。我在別的文章裏曾經說過這一段話：「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可以明白古希臘人何以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把詩神亞波羅擺在蔚藍的山巔，俯瞰衆生擾攘，而眉宇間卻常如作甜蜜夢，不露一絲被擾動的神色？」這裏所謂「靜穆」(Serenity)自然祇是一種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詩裏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臘——尤其是古希臘的造形藝術——常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靜穆」是一種豁然大悟，得到歸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觀音大士，超一切憂喜，同時你也可以說它泯化一切憂喜。這種境界在中國詩裏不多見。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古希臘人，也許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的罷，這一點我毫無知識。但以現存的希臘詩歌而論，荷馬的史詩，是雄大而活潑的，沙孚的戀歌，是明白而熱烈的，都不靜穆。我想，立『靜穆』爲詩的極境，而此境不見于詩，也許和立蛋形爲人體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終不見于人一樣。至于亞波羅之在山巔，那可因爲他是『神』的緣故，無論古今，凡神像，總是放在較高之處的。這像，我曾見過照相，睜着眼睛，神清氣爽，並不像『常如作甜蜜夢』。不過看見實物，是否『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在我可就很難斷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覺得，我以爲也許有些因爲他『古』的緣故。

我也是常常徘徊于雅俗之間的人，此刻的話，很近于大煞風景，但有時卻自以爲頗『雅』的：間或喜歡看看古董。記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認識了一個土財主，不知怎麼一來，他也忽然『雅』起來了，買

了一個鼎，據說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駁，古色古香。而不料過不幾天，他竟叫銅匠把牠的土花和銅綠擦得一乾二淨，這才擺在客廳裏，閃閃的發着銅光。這樣的擦得精光的古銅器，我一生中還沒有見過第二個。一切『雅士』，聽到的無不大笑，我在當時，也不禁由喫驚而失笑了，但接着就變成肅然，好像得了一種啓示。這啓示並非『哲學的意蘊』，是覺得這才看見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現代，我們的碗，無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當時，一定是乾乾淨淨，金光燦爛的，換了術語來說，就是牠並不『靜穆』，倒有些『熱烈』。這一種俗氣至今未脫，變化了我衡量古美術的眼光，例如希臘雕刻罷，我總以爲牠現在之見得『祇剩一味醇樸』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經風雨，失去了鋒稜和光澤的緣故，雕造的當時，一定是嶄新，雪白，而且發閃的，所以我們現在所見的希臘之美，其

實並不準是當時希臘人之所謂美，我們應該懸想牠是一件新東西。

凡論文藝，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在藝術，會迷惘于土花，在文學，則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錢起的兩句，而踢開他的全篇，又用這兩句來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這兩句來打殺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輩，以爲『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其實是他們四位，都因爲墊高朱先生的美學說，做了冤屈的犧牲的。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看錢起的全篇罷：

『省試湘靈鼓瑟』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由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要證成『醇樸』或『靜穆』，這全篇實在是不宜稱引的，因為中間的四聯，頗近于所謂『衰颯』。但沒有上文，末兩句便顯得含糊，不過這含糊，卻也許又是稱引者之所謂超妙。現在一看題目，便明白『曲終』者結『鼓瑟』，『人不見』者點『靈』字，『江上數峯青』者做『湘』字，全篇雖不失為唐人的好試帖，但末兩句也並不怎麼神奇了。況且題上明說是『省試』，當然不會有『憤憤不平的樣子』，假使屈原不和椒蘭吵架，卻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約也不至于在考卷上大發牢騷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們于是應該再來看看這『湘靈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詩了。但我手頭也沒有他的詩集，只有一部『大歷詩略』，也是迂夫子的選本，不過篇數卻不少，其中有一首是：

『下第題長安客舍』

不遂青雲望，愁看黃鳥飛。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世事隨時變，交情與我違。空餘主人柳，相見却依依。』

一落第，在客棧的牆壁上題起詩來，他就不免有些憤憤了，可見那一首『湘靈鼓瑟』，實在是因爲題目，又因爲省試，所以只好如此圓轉活脫。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時都不免是怒目金剛，但就全體而論，他長不到丈六。

世間有所謂『就事論事』的辦法，現在就詩論詩，或者也可以說是無礙的罷。不過我總以爲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身，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爲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但我也並非反對說夢，我只主張聽者心裏明白所聽的是說夢，這和我勸那些認真的讀者不要專憑選本和標點本爲法寶來研究文學的意思，大致並無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過較多的作品，就知

道歷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現在之所以往往被尊爲『靜穆』，是因為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縮小，凌遲了。

八

現在還在流傳的古人文集，漢人的已經沒有略存原狀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裏還有別人的贈答和論難，晉的阮籍，集裏也有伏羲的來信，大約都是很古的殘本，由後人重編的。『謝宣城集』雖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賦詠的詩。我以為這樣的集子最好，因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見他和別人的關係，他的作品，比之同詠者，高下如何，他爲什麼要說那些話……現在採取這樣的編法的，據我所知道，則『獨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

關的別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謹嚴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只刪存一個或者三四個字，刻之泰山頂上，『傳之其人』，那當然聽他自己的便，還有鬼蜮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將保佑，姓名大可公開，他卻偏要躲躲閃閃，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發生關係，隨作隨刪，刪到只剩下一張白紙，到底什麼也沒有，那當然也聽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會有些關係的文字，我以為是都應該集印的，其中當然夾雜着許多廢料，所謂『榛楛弗剪』，然而這才是深山大澤。現在已經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只要用鉛字一排就够。雖說排印，糟蹋紙墨自然也還是糟蹋紙墨的，不過只要一想連楊邨人之流的東西也還在排印，那就無論什麼都可以閉着眼睛發出去了。中國人常說，『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

小無恥之旗，固然要引出無恥羣，但使謙讓者潑刺起來，卻是一利。

收回了謙讓的人，在實際上也並不少，但又是所謂『愛惜自己』的居多。『愛惜自己』當然並不是壞事情，至少，他不至于無恥，然而有些人往往誤認『裝點』和『遮掩』爲『愛惜』。集子裏面，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臉上，種上一撮白鬚；也有兼收別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揀選，決不取謾罵認贓的文章，以爲無價值。其實是這些東西，一樣的和本文都有價值的，即使那力量還不够引出無恥羣，但倘和有價值的本文有關，這就是牠在當時的價值。中國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這一點的，所以歷史裏大抵有循吏傳，隱逸傳，卻也有酷吏傳和佞倖傳，有忠臣傳，也有奸臣傳。因爲不如此，便無從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倆隨時消滅，也不能洞曉反鬼蜮者和人和文

章。山林隱逸之作不必論，倘使這作者是身在人間，帶些戰鬪性的，那麼，他在社會上一定有敵對。只是這些敵對決不肯自承，時時撒嬌道『冤乎枉哉，這是我把我當作假想敵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確在放暗箭，一經指出，這才改爲明鎗，但又說這是因爲被誣爲『假想敵』的報復。所用的技倆，也是決不肯任其流傳的，不但事後要牠消滅，就是臨時也在躲閃；而編集子的人又不屑收錄。于是到得後來，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無可對比，當時的抗戰之作，就都好像無的放矢，獨個人在向着空中發瘋。我嘗見人評古人的文章，說誰是『鋒稜太露』，誰又是『劍拔弩張』，就因爲對面的文章，完全消滅了的緣故，倘在，是也許可以減去評論家幾分懵懂的。所以我以爲以後該有博採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爲附錄的集子。以前雖無成例，卻是留給後來的寶貝，其功用與鑄了魑魅罔兩的形狀的禹

鼎相同。

就是近來的有些期刊，那無聊，無恥與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這又確是現代中國的或一羣人的『文學』，現在可以知今，將來可以知古，較大的圖書館，都必須保存的。但記得C君曾經告訴我，不但這些，連認真切實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只在外國的雜誌，一大本一大本的裝起來：還是生着『貴古而賤今，忽近而圖遠』的老毛病。

九

仍是上文說過的所謂『珍本叢書』之一的張岱『瑯嬛文集』，那卷三的书牘類裏，有『又與毅儒八弟』的信，開首說：

『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鍾譚者，必棄置不

取；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痛罵鍾譚，而吾弟選法又與前一變，有一字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鍾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識，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斯極耶？蓋吾弟喜鍾譚時，有鍾譚之好處，儘有鍾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爲連城；吾弟恨鍾譚時，有鍾譚之不好處，仍有鍾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可盡棄爲瓦礫。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胸中，虛心平氣，細細論之，則其研醜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尙爲好尙哉！……」

這是分明的畫出隨風轉舵的選家的面目，也指證了選本的難以憑信的。張岱自己，則以爲選文造史，須無自己的意見，他在『與李硯翁』的信裏說：『弟『石匱』一書，泚筆四十餘載，心如止水秦銅，

並不自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劃，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鏡，也不能虛，所以立『虛心平氣』爲選詩的極境，『並不自立意見』爲作史的極境者，也像立『靜穆』爲詩的極境一樣，在事實上不可得。數年前的文壇上所謂『第三種人』杜衡輩，標榜超然，實爲羣醜，不久卽本相畢露，知恥者皆羞稱之，無待這里多說了；就令自覺不懷他意，屹然中立如張岱者，其實也還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論東林云：

『……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沈，用占世數興敗，其黨盛則爲終南之捷徑，其黨敗則爲元祐之黨碑。……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戴者皆爲小人，招徠者亦有君子，此其間線索甚清，門戶甚迥。……東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

不必置論，如貪婪強橫之王圖，奸險兇暴之李三才，闖賊首
輔之項煜，上箋勸進之周鐘，以致竄入東林，乃欲俱奉之以
君子，則吾臂可斷，決不敢徇情也。東林之尤可醜者，時敏
之降闖賊曰，「吾東林時敏也」，以冀大用。魯王監國，葛
爾小朝廷，科道任孔當輩猶曰，「非東林不可進用」。則是
東林二字，直與葛爾魯國及汝偕亡者。手及此輩，置之湯
鑊，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這真可謂『詞嚴義正』。所舉的羣小，也都確實的，尤其是時
敏，雖在三百年後，也何嘗無此等人，真令人驚心動魄。然而他的嚴
責東林，是因爲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羣，于
是凡有黨社，必爲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
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或者還更加一轉云：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

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兩面都有好壞，並無不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醜，反東林者本爲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爲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爲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麼，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謝國楨先生作『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鉤索文籍，用力甚勤，敍魏忠賢兩次虐殺東林黨人畢，說道：『那時候，親戚朋友，全遠遠的躲避，無恥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黨的旗幟底下了。說一兩句公道話，想替諸君子幫忙的，只有幾個書獃子，還有幾個老百姓。』

這說的是魏忠賢使緹騎捕周順昌，被蘇州人民擊散的事。誠然，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裏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

及之處的。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游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閉于城外，使受凍餒，『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飢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驅驅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張岱又說：『忠臣義士多見于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越絕詩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現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願！

（十二月十八——十九夜。）

論新文字

漢字拉丁化的方法一出世，方塊字系的簡筆字和注音字母，都賽下去了，還在競爭的只有羅馬字拼音。這拼法的保守者用來打擊拉丁化字的最大的理由，是說它方法太簡單，有許多字很不容易分別。

這確是一個缺點。凡文字，倘若容易學，容易寫，常常是未必精密的。煩難的文字，固然不見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卻總不免比較的煩難。羅馬字拼音能顯四聲，拉丁化字不能顯，所以沒有『東』『董』之分，然而方塊字能顯『東』『竦』之分，羅馬字拼音卻也不能顯。單拿能否細別一兩個字來定新文字的優劣，是並不確當的。況且文字一用于組成文章，那意義就會明顯。雖是方塊字，倘若單取一

兩個字，也往往難以確切的定出它的意義來。例如『日者』這兩個字，如果只是這兩個字，我們可以作『太陽這東西』解，可以作『近幾天』解，也可以作『占卜吉凶的人』解；又如『果然』，大抵是『竟是』的意思，然而又是一種動物的名目，也可以作隆起的形容；就是一個『一』字，在孤立的時候，也不能決定它是數字『一二三』之『一』呢，還是動詞『四海一』之『一』。不過組織在句子裏，這疑難就消失了。所以取拉丁化的一兩個字，說它含糊，並不是正當的指摘。

主張羅馬字拼音和拉丁化者兩派的爭執，其實並不在精密和粗疏，卻在那由來，也就是目的。羅馬字拼音者是以古來的方塊字為主，翻成羅馬字，使大家都來照這規矩寫，拉丁化者卻以現在的方言為主，翻成拉丁字，這就是規矩。假使翻一部『詩韻』來作比賽，後

者是賽不過的，然而要寫出活人的口語來，倒輕而易舉。這一點，就可以補它的不精密的缺點而有餘了，何況後來還可以憑着實驗，逐漸補正呢。

易舉和難行是改革者的兩大派。同是不滿于現狀，但打破現狀的手段卻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復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難行，一是易舉。這兩者有鬥爭。難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藉此來阻礙易舉者的進行，然而它本身，卻因為是虛懸的計畫，結果總並無成就：就是不行。

這不行，可又正是難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為它雖無改革之實，卻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極愛談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邊，卻使他恐懼。惟有大談難行的改革，這才可以阻止易舉的改革的到來，就是竭力維持着現狀，一面大談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

改革的事業。這和主張在牀上學會了浮水，然後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實是一樣的。

拉丁化卻沒有這空談的弊病，說得出，就寫得來，它和民衆是有聯繫的，不是研究室或書齋裏的清玩，是街頭巷尾的東西；它和舊文字的關係輕，但和人民的聯繫密，倘要大家能够發表自己的意見，收穫切要的知識，除它以外，確沒有更簡易的文字了。

而且由只識拉丁化字的人們寫起創作來，才是中國文學的新生，才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學，因為他們是沒有中一點什麼『莊子』和『文選』之類的毒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

「死魂靈百圖」小引

果戈理開手作『死魂靈』第一部的時候，是一八三五年的下半年，離現在足有一百年了。幸而，還是不幸呢，其中的許多人物，到現在還很有生氣，使我們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讀者，也覺得彷彿寫着自己的周圍，不得不歎服他偉大的寫實的本領。不過那時的風尚，卻究竟有了變遷，例如男子的衣服，和現在雖然小異大同，而閨秀們的高髻圓裙，則已經少見；那時的時髦的車子，並非流線形的摩托卡，卻是三匹馬拉的篷車，照着跳舞夜會的所謂眩眼的光輝，也不是電燈，只不過許多插在多臂燭臺上的蠟燭；凡這些，倘使沒有圖畫，是很難想像清楚的。

關於『死魂靈』的有名的圖畫，據里斯珂夫說，一共有三種，而最正確和完備的是阿庚的百圖。這圖畫先有七十二幅，未詳何年出版，但總在一八四七年之前，去現在也快要九十年；後來即成爲難得之品，新近蘇聯出版的『文學辭典』裏，曾採它爲插畫，可見已經是有了定評的文獻了。雖在它的本國，恐怕也只能在圖書館中相遇，更何況在我們中國。今年秋末，孟十還君忽然在上海的舊書店裏看到了這畫集，便像孩子望見了糖果似的，立刻奔走呼號，總算弄到手裏了，是一八九三年印的第四版，不但百圖完備，還增加了收藏家蔣甫列摩夫所藏的三幅，并那時的廣告畫和第一版封紙上的小圖各一幅，共計一百零五圖。

這大約是十月革命之際，俄國人帶了逃出國外來的；他該是一個愛好文藝的人，抱守了十六年，終于只好拿它來換衣食之資；在中

國，也許未必有第二本。藏了起來，對己對人，說不定都是一種罪業，所以現在就設法來翻印這一本書，除紹介外國的藝術之外，第一，是在獻給中國的研究文學，或愛好文學者，可以和小說相輔，所謂『左圖右史』，更明白十九世紀上半的俄國中流社會的情形，第二，則想獻給插畫家，藉此看看別國的寫實的典型，知道和中國向來的『出相』或『繡像』有怎樣的不同，或者能有可以取法之處；同時也以慰售出這本畫集的人，將他的原本化為千萬，廣布于世，實足償其損失而有餘，一面也庶幾不枉孟十還君的一番奔走呼號之苦。對於木刻家，卻恐怕並無大益，因為這雖說是木刻，但畫者一人，刻者又別一人，和現在的自畫自刻，刻即是畫的創作木刻，是已經大有差別的了。

世間也真有意外的運氣。當中文譯本的『死魂靈』開始發表時，

曹靖華君就寄給我一卷圖畫，也還是十月革命後不多久，在彼得堡得到的。這正是里斯柯夫所說的梭可羅夫畫的十二幅。紙張雖然頗為破碎，但圖像並無大損，怕它由我而亡，現在就付印在阿庚的百圖之後，於是俄國藝術家所作的最寫實，而且可以互相補助的兩種『死魂靈』的插畫，就全收在我們的這一本集子裏了。

移譯序文和每圖的題句的，也是孟十還君的勞作；題句大概依照譯本，但有數處不同，現在也不改從一律；最末一圖的題句，不見于第一部中，疑是第二部乞乞科夫免罪以後的事，這是那時俄國文藝家的習尚：總喜歡帶點教訓的。至于校印裝製，則是吳朗西君和另外幾位朋友們所經營。這都應該在這裡聲明謝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魯迅。

後記

這一本的編輯的體例，是和前一本相同的，也是按照着寫作的時候。凡在刊物上發表之作，上半年也都經過官廳的檢查，大約總不免有些刪削，不過我懶于一一校對，加上黑點爲記了。只要看過前一本，就可以明白犯官忌的是那些話。

被全篇禁止的有兩篇：一篇是『什麼是諷刺』，爲文學社的『文學百題』而作，印出來時，變了一個『缺』字；一篇是『從幫忙到扯淡』，爲『文學論壇』而作，至今無踪無影，連『缺』字也沒有了。

爲了寫作者和檢查者的關係，使我間接的知道了檢查官，有時頗爲佩服。他們的嗅覺是很靈敏的。我那一篇『從幫忙到扯淡』，原在指那些唱導什麼兒童年，婦女年，讀經救國，敬老正俗，中國本位文化，第三種人文藝等等的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學士，從已經不會幫忙，只能扯淡這方面看起來，確也應該禁止的，因爲實在看得太明，說得太透。別人大約也和我一樣的佩服，所以早有文學家做了檢查官的風傳，致使蘇汶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的『大晚報』上發表了這樣的公開信：

「火炬編輯先生大鑑：

頃讀本月四日貴刊文學評論專號，載署名聞問君的『文學雜談』一文，中有——

「據道路傳聞蘇汶先生有以七十元一月之薪金彈冠入×

×（照錄原文）會消息，可知文藝雖不受時空限制，却頗受「大洋」限制了。」

等語，聞之不勝憤慨。汝於近數年來，絕未加入任何會工作，并除以編輯現代雜誌及賣稿糊口外，亦未受任何組織之分文薪金。所謂入××會云云，雖經×報謠傳，均以一笑置之，不料素以態度公允見稱之貴刊，亦復信此譏言，披諸報端，則殊有令人不能已於言者，汝爲愛護貴刊起見，用特申函奉達，尙祈將原書賜登最近貴刊，以明真相是幸。專此敬頌

編安。

蘇汝（杜衡）謹上。十二月五日。」

一來就說作者得了不正當的錢是近來文壇上的老例，我被人傳說拿着盧布就有四五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以後，這才將盧布說取消，換

上了『親日』的更加新鮮的罪狀。我是一向不『爲愛護貴刊起見』的，所以從不寄一封辨正信。不料越來越濫，竟謠到蘇汝先生頭上去，可見謠言多的地方，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但由我的經驗說起來，檢查官之『愛護』『第三種人』，卻似乎是眞的，我去年所寫的文章，有兩篇冒犯了他們，一篇被刪掉（『病後雜談之餘』），一篇被禁止（『臉譜臆測』）了。也許還有類于這些的事，所以令人猜爲『入××（照錄原文）會』了罷。這真應該『不勝憤慨』，沒有受慣奚落的作家，是無怪其然的。

然而在對於眞的造謠，毫不爲怪的社會裏，對於眞的收賄，也就毫不爲怪。如果收賄會受制裁的社會，也就要制裁妄造收賄的謠言的人們。所以用造謠來傷害作家的期刊，它只能作報銷，在實際上很少功效。

其中的四篇，原是用日本文寫的，現在自己譯出，並且對於中國的讀者，還有應該說明的地方——

一，『活中國的姿態』的序文裏，我在對於『支那通』加以譏刺，且說明日本人的喜歡結論，語意之間好像笑着他們的粗疏。然而這脾氣是也有長處的，他們的急于尋求結論，是因為急于實行的緣故，我們不應該笑一笑就完。

二，『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是在六月號的『改造』雜誌上發表的，這時我們的『聖裔』，正在東京拜他們的祖宗，興高采烈。曾由亦光君譯出，載于『雜文』雜誌第二號（七月），現在略加改定，轉錄在這裡。

三，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裏，我聲明了我的高興，

但還有一種原因卻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復了我個人的私讎。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於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面的『小說』一部分的；『閒話』裏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帶進墳墓裏去了。

四 『關於陀思妥夫斯基的事』是應三笠書房之託而作的，是寫給讀者看的紹介文，但我在這裏，說明着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決不能成爲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並不相同。

臨末我還要記念鎌田誠一君，他是內山書店的店員，很愛繪畫，我的三回德俄木刻展覽會，都是他獨自布置的；一二八的時候，則由他送我和我的家屬，以及別的一批婦孺逃入英租界。三三年七月，以病在故鄉去世，立在他的墓前的是我手寫的碑銘。雖在現在，一想到那時只是當作有趣的記載着我的被打被殺的新聞，以及爲了八十塊錢，令我往返數次，終于不給的書店，我對於他，還是十分感愧的。

近兩年來，又時有前進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現在不大寫文章，并聲明他們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無可置辯的，但也有一點誤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從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裏的最末一篇止，共歷十八年，單是雜感，約有八十字。後九年中的所寫，比前九年多兩倍；而這後九年中，近三年所

寫的字數，等于前六年，那麼，所謂『現在不大寫文章』，其實也並非確切的核算。而且這些前進的青年，似乎誰都沒有注意到現在的對于言論的迫壓。也很是令人覺得詫異的。我以為要論作家的作品，必須兼想到周圍的情形。

自然，這情形是極不容易明瞭的，因為倘一公開，作家要怕受難，書店就要防封門，然而如果自己和出版界有些相關，便可以感覺到這裏面的一部份消息。現在我們先來回憶一下已往的公開的事情。也許還有讀者記得，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的『大美晚報』上，曾經登有一則這樣的新聞——

中央黨部禁止新文藝作品

滬市黨部於上月十九日奉中央黨部電令、派員挨戶至各新書店、查禁書籍至百四十九種之多、牽涉書店二十五家、其中

有曾經市黨部審查准予發行、或內政部登記取得著作權、且有各作者之前期作品、如丁玲之「黑暗中」等甚多、致引起上海出版業之恐慌、由新書業組織之中國著作人出版人聯合會集議、於二月二十五日推舉代表向市黨部請願結果、蒙市黨部依允轉呈中央、將各書重行審查、從輕發落、同日接中央覆電、允予照准、惟各書店於復審期內、須將被禁各書、一律自動封存、不再發賣、茲將各書店被禁書目、分錄如次、

店 名 書 名

譯著者

神 州 政治經濟批評

郭沫若

文藝批評集

錢杏邨

浮士德與城

柔 石

現代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石炭王

郭沫若

黑貓

郭沫若

創造十年

郭沫若

果樹園

魯迅

田漢戲曲集（五集）

田漢

檀泰琪兒之死

田漢

平林泰子集

沈端先

殘兵

周全平

沒有櫻花

蓬子

掙扎

樓建南

夜會

丁玲

詩稿

炭礦夫

光慈遺集

麗沙的哀怨

野祭

語體文作法

藤森成吉集

愛與仇

新俄文學中的男女

大學生私生活

唯物史觀研究上下

十姑的悲愁

胡也頻

龔冰廬

蔣光慈

蔣光慈

蔣光慈

高語罕

森 堡

森 堡

周起應

周起應

華 漢

華 漢

光
華

歸家

流亡

萌芽

幼年時代

文藝論集

文藝論續集

煤油

高爾基文集

離婚

小天使

我的童年

結婚集

洪靈菲

洪靈菲

巴金

郭沫若

郭沫若

郭沫若

郭沫若

魯迅

潘漢年

蓬子

蓬子

蓬子

婦人之夢

病與夢

路

自殺日記

我們的一團與他

三個不統一的人物

現在中國作家選集

新文藝辭典

郭沫若論

新興文學概論

沒落的靈魂

文藝創作辭典

蓬子

樓建南

茅盾

丁玲

馮雪峯

胡也頻

蔣光慈

顧鳳城

顧鳳城

顧鳳城

顧鳳城

顧鳳城

湖
風

現代名人書信

文章及其作法

獨清文藝論集

煨煉

暗雲

我在歐洲的生活

美術考古學發現史

青年自修文學讀本

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

飢餓的光芒

惡黨

萬寶山

高語罕

高語罕

王獨清

王獨清

王獨清

王獨清

郭沫若

錢杏邨

田漢

蓬子

樓建南

李輝英

南
強

隱蜜的愛

森堡

寒梅

華漢

地泉

華漢

賭徒

洪靈菲

地下室手記

洪靈菲

屠場

郭沫若

新文藝描寫辭典

錢杏邨

(正續編)

怎樣研究新興文學

錢杏邨

新興文學論

沈端先

鐵流

楊騷

十月

楊騷

大江

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

魯迅

毀滅

魯迅

藝術論

魯迅

文學及藝之技術的革命

陳望道

藝術簡論

陳望道

社會意識學大綱

陳望道

宿莽

茅盾

野薔薇

茅盾

韋護

丁玲

現代歐洲的藝術

馮雪峯

藝術社會學底任務及問題

馮雪峯

水沫

文藝與批評

魯迅

文藝政策

銀玲

文學評論

流冰

藝術之社會的基礎

藝術與社會生活

往何處去

偉大的戀愛

魯迅自選集

蘇俄短篇小說

茅盾自選集

而已集

魯迅

蓬子

馮雪峯

馮雪峯

馮雪峯

馮雪峯

胡也頻

周起應

魯迅

樓建南

茅盾

迅

天馬

北新

三閑集

魯迅

偽自由書

魯迅

文學概論

潘梓年

處女的心

蓬子

舊時代之死

柔石

新俄的戲劇與跳舞

馮雪峯

一週間

蔣光慈

衝出雲圍的月亮

蔣光慈

合衆

二心集

魯迅

勞動的福音

錢杏邨

亞東

義塚

蔣光慈

少年飄泊者

蔣光慈

鳴綠江上

蔣光慈

紀念碑

蔣光慈

百花亭畔

高語罕

白話書信

高語罕

兩個女性

華漢

轉變

洪靈菲

文藝

安特列夫評傳

錢杏邨

光明

青年創作辭典

錢杏邨

暗雲

王獨清

泰東

現代中國文學作家

錢杏邨

枳花集

馮雪峯

俄國文學概論

光慈

中華

前綫

咖啡店之一夜

日本現代劇選

一個女人

一幕悲劇寫實

蘇俄文學理論

春蠶

虹

蝕

三人行

子夜

在黑暗中

洪靈菲

田漢

田漢

丁玲

胡也頻

陳望道

茅盾

茅盾

茅盾

茅盾

茅盾

丁玲

民智
樂華

鬼與人心

美術概論

世界文學史

中外文學家辭典

獨清白選集

社會科學問答

文藝
兒童

窮兒苦狗記

良友

蘇聯童話集

商務

希望

一個人的誕生

聖徒

新中國

水

胡也頻

陳望道

余慕陶

顧鳳城

王獨清

顧鳳城

樓建南

樓建南

柔石

丁玲

胡也頻

丁玲

華通 別人的幸福

胡也頻

樂華 黎明之前

龔冰廬

中學生 中學生文藝辭典

顧鳳城

出版界不過是藉書籍以貿利的人們，只問銷路，不管內容，存心『反動』的是很少的，所以這請願頗有了好結果，爲『體恤商艱』起見，竟解禁了三十七種，應加刪改，才准發行的是二十二種，其餘的還是『禁止』和『暫緩發售』。這中央的批答和改定的書目，見于『出版消息』第三十三期（四月一日出版）——

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批答執字第一五九

二號

（呈爲奉令禁燬大宗刊物附奉說明書懇情轉函中宣會重行審核從輕處置以恤商艱由）

呈件均悉查此案業准

中央宣傳委員會公函並決定辦法五項一、平林泰子集等三十種早經分別查禁有案應切實執行前令嚴予禁燬以絕流傳二、政治經濟學批判等三十種內容宣傳普羅文藝或挑撥階級鬥爭或詆毀黨國當局應予禁止發售三、浮士德與城等三十一種或係介紹普羅文學理論或係新俄作品或含有不正確意識者頗有宣傳反動嫌疑在剿匪嚴重時期內應暫禁發售四、創造十年等二十二種內容間有詞句不妥或一篇一段不妥應刪改或抽去後方准發售五、聖徒等三十七種或係戀愛小說或係革命以前作品內容均尚無礙對於此三十七種書籍之禁令准予暫緩執行用特分別開列各項書名單函達查照轉飭遵照

等由合仰該書店等遵照中央決定各點並單開各種刊物
分別繳燬停售具報毋再延誤是爲至要件存此批

「附抄發各項書名單一份」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

常務委員 吳醒亞

潘公展

童行白

先後查禁有案之書目（略）

這樣子，大批禁燬書籍的案件總算告一段落，書店也不再開口
了。

然而還剩着困難的問題：書店是不能不陸續印行新書和雜誌的，

所以還是永遠有陸續被扣留，查禁，甚而至于封門的危險。這危險，首先于店主有虧，那就當然要有補救的辦法。不多久，出版界就有了一種風聞——真只是一種隱約的風聞——

不知道何月何日，黨官，店主和他的編輯，開了一個會議，討論善後的方法。着重的是在新的書籍雜誌出版，要怎樣才可以免于禁止。聽說這時就有一位雜誌編輯先生某甲，獻議先將原稿送給官廳，待到經過檢查，得了許可。這才付印，文字固然決不會『反動』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謂公私兼利。別的編輯們好像也無人反對，這提議完全通過了。散出的時候，某甲之友也是編輯先生的某乙，很感動的向或一書店代表道：『他犧牲了個人，總算保全了一種雜誌！』

『他』者，某甲先生也；推某乙先生的意思，大約是以爲這種獻

策，頗于名譽有些損害的。其實這不過是神經衰弱的憂慮。即使沒有某甲先生的獻策，檢查書報是總要實行的，不過用了別一種緣由來開始，況且這獻策在當時，人們不敢縱談，報章不敢記載，大家都認某甲先生爲功臣，于是也就是虎鬚。誰也不敢捋，所以至多不過交頭接耳，局外人知道的就很少，——于名譽無關。

總而言之，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到底在上海出現了，于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字第……號』字樣，說明着該抽去的已經抽去，該刪改的已經刪改，並且保證着發賣的安全——不過也並不完全有效，例如我那『二心集』被刪剩的東西，書店改名『拾零集』，是經過檢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沒收。這種亂七八遭，自然是普通現象，並不足怪，但我想，也許是還帶着一點私仇，因爲杭州省黨部的有力人物，久已是

復旦大學畢業生許紹棣老爺之流，而當『語絲』登載攻擊復旦大學的來函時，我正是編輯，開罪不少。爲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也是浙江省黨部發起的，但至今還沒有呈請發掘祖墳，總算黨恩高厚。

至于審查員，我疑心很有些『文學家』，倘不，就不能做得這麼令人佩服。自然，有時也刪禁得令人莫名其妙，我以爲這大概是在示威，示威的脾氣，是雖是文學家也很難脫體的，而且這也不算是惡德。還有一個原因，則恐怕是在飯碗。要喫飯也決不能算是惡德，但喫飯，審查的文學家和被審查的文學家卻一樣的艱難，他們也有競爭者，在看漏洞，一不小心便會被搶去了飯碗，所以必須常常有成績，就是不斷的禁，刪，禁，刪，第三個禁，刪。我初到上海的時候，曾經看見一個西洋人從旅館裏出來，幾輛洋車便向他飛奔而去，他坐了

一輛，走了。這時忽然來了一位巡捕，便向拉不到客的車夫的頭上敲了一棒，撕下他車上的照會。我知道這是車夫犯了罪的意思，然而不明白爲什麼拉不到客就犯了罪，因爲西洋人只有一個，當然只能坐一輛，他也並沒有爭。後來幸蒙一位老上海告訴我，說巡捕是每月總得捉多少犯人的，要不然，就算他懶惰，于飯碗頗有礙。真犯罪的不易得，就只好這麼創作了。我以爲審查官的有時審得古裏古怪，總要在稿子上打幾條紅槓子，恐怕也是這緣故。倘使真的這樣，那麼，他們雖然一定要把我的『契訶夫選集』做成『殘山賸水』，我也還是諒解的。

這審查辦得很起勁，據報上說，官民一致滿意了。九月二十五日的『中華日報』云——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會工作緊張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自在滬成立以來、迄今四閱月、審查各種雜誌書籍、共計有五百餘種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員審查字、在十萬以上、審查手續、異常迅速、雖得公巨著、至多不過二天、故出版界咸認爲有思想不到之快、予以便利不少、至該會審查標準、如非對黨對政府絕對顯明不利之文字、請其刪改外、餘均一秉大公、私毫偏袒、故數月來相安無事、過去出版界、因無審查機關、往公出書以後、受到扣留或查禁之事、自審查會成立後、此種事件、已不再發生矣、聞中央方面、以該會工作成績優良、而出版界又甚需要此種組織、有增加內部工作人員計劃、以便利審查工作云、

如此善政，行了還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閒話皇帝』

事件。大約是受了日本領事的警告罷，那雷厲風行的辦法，比對於『反動文字』還要嚴：立刻該報禁售，該社封門，編輯者杜重遠已經自認該稿未經審查，判處徒刑，不准上訴的了，卻又革掉了七位審查官，一面又往書店裏大搜涉及日本的舊書，牆壁上貼滿了『敦睦邦交』的告示。出版家也顯出孤苦零丁模樣，據說：這『一秉大公』的『中央宣傳部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不見了，拿了稿子，竟走投無路。

那麼，不是還我自由，飄飄然了麼？並不是的。未有此會以前，出版家倒還有一點自己的脊梁，但已有此會而不見之後，卻真覺得有些搖搖擺擺。大抵的農民，都能够自己過活，然而奧國和俄國解放農奴時，他們中的有些人，卻哭起來了，因為失了依靠，不知道自己怎麼過活。況且我們的出版家並非單是『失了依靠』，乃是遇到恢復了某甲先生獻策以前的狀態，又會扣留，查禁，封門，危險得很。而且除

怕被指爲『反動文字』以外，又得怕違反『敦睦邦交令』了。已被『訓』成軟骨症的出版界，又加上了一副重擔，當局對於內交，又未必肯怎麼『敦睦』，而『禮讓爲國』，也急于『體恤商艱』，所以我想，自有『審查會』而又不見之後，出版界的一大部份，倒真的成了孤哀子了。

所以現在的書報，倘不是先行接洽，特准激昂，就只好一味含糊，但求無過，除此之外，是依然會有先前一樣的危險，挨到木棍，撕去照會的。

評論者倘不瞭解以上的大略，就不能批評近三年來的文壇。即使批評了，也很難中肯。

我在這一年中，日報上並沒有投稿。凡是發表的，自然是含糊的

居多。這是帶着枷鎖的跳舞，當然只足發笑的。但在我自己，卻是一個紀念，一年完了，過而存之，長長短短，共四十七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夜半至一月一日晨，寫訖。

且介亭雜文
且介亭雜文二集
且介亭雜文末編

實價六角
實價六角五分
實價五角五分

且介亭雜文二集

一九三七年七月初版

實價 六角五分

著作者

魯迅

印行者

上海三閱書屋

總代售

內山書店

上海施高塔路十一號

不許翻印





鲁迅杂文集

影印说明

鲁迅先生的著作，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也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适应广大群众学习鲁迅著作的需要，我们特影印鲁迅全部杂文集十五种，并以此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881.9.）一百十周年和逝世（1936.10.）五十五周年。

以上杂文集，均由鲁迅先生亲自编定。鲁迅先生对于封面设计和书籍装帧一贯十分重视，有的参与意见，有的还自书书名，使每部集子都各具特色，成为令人爱不释手的出版物。现据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的初版本影印，均保持原书风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鲁迅纪念馆

1991年10月

且介亭杂文二集

鲁迅杂文集（影印本）

- 《热风》
《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三闲集》
《二心集》
《伪自由书》
《南腔北调集》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ISBN 7-5321-0950-X/I·693

定价：4.80元